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2月15日第3期 总第21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3期

目录

【专稿】

小 鹰 文革问答三

一、文革不是什么？

二、文革是什么？

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四、结 语

【子夜谭】

何與懷 必须守住真正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读书】

乔晞华 文革暴力、分期与定义——兼谈定量分析法在文革研究中的运用

余汝信 聂元梓与安子文“特务电台报案”

陆 凌 为历史作证——再读《平原上的歌谣》

【怀人】

张 鸣 一个厚重的背影——哭学泰老师

【述往】

丁东红 我的妈妈胡志涛在“八·五事件”前后

安希孟 当年逾墙偷桃，后来培植桃李——一位中学班主任的文革琐忆

【资料】

李南央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用报告（1967年10月16日）

【本刊声明】

【专稿】

文革问答三

小 鹰

[摘要]本文旨在说明文革的实质，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同时批评了杨继绳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论，最后论述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以及“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文目录：

- 一、文革不是什么？
- 二、文革是什么？
- 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 四、结 语

一、文革不是什么？

提要：

- 文革不是“反官僚”。
- 杨继绳依据毛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错误地认为，文革的起因是“官民矛盾”，文革的实质是“反官僚”。
- 文革前确实存在着“官民矛盾”，但民众之怨气主要不是针对走资派，而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以及各种政治运动。

甲：现在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轻人往往以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反官僚”、“反贪腐”，毛主席给了人民“大民主”，因此是好事，故也怀念

毛时代。那么，文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毛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乙：是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文革结束四十多年了，至今众说纷纭。不仅年轻人那样想，一些造反派现在反思时，也以为毛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英明的领袖。例如，杨继绳认为，“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洁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¹

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批示。杨继绳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批示中，“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并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²这样替工人说话，真让人“热血沸腾”啊！

乙：从表面来看，文革似乎是解决“官民矛盾”的运动，它也的确冲击了大部分干部，造反派可以“批斗”官员，公开揭发他们的“罪恶”。但这种逻辑有两点说不通的地方。第一，“官僚”是个含糊的概念。人们通常是在作风和道德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指脱离群众、无所事事，以至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这就说不通。

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心高气傲的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他却一意孤行，拒不认错！

¹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2012年为孙怒涛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作的序。

²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为“导论”收入作者的《天翻地复——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

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时节百姓不是表现得更憎恨他们吗？

所谓造反派也很含糊。同样，只有跟着毛去倒刘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帮”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丁祖晓、王容芬等就都是“反革命”！

甲：你是说，这貌似正义公平的“反官僚”现象之下，有一条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划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讲明了这一点，只是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在内，对此“视而不见”，至今还在“隔靴搔痒”地谈论“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此外，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间的内斗，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反官僚”一说的另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甲：杨继绳这样来解释，即毛认为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特权阶层”¹，所以也要批斗。

乙：这种推广把党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学术权威”，都纳入了“特权阶层”，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这是想给毛泽东发动疯狂的文革找一个“正当”，甚至“正义”的理由吗？

甲：我也觉得那样讲很“牵强附会”，因为那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

¹ 同前。

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

乙：所以，这里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甲：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时间一长，总会滋生贪官污吏，这也是事实。

乙：不错，解放后，干部收入高些，也的确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难时期的“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等(指困难时期17级和13级以上的干部有些额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应)。但总体上，那时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和猖狂。

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高级干部的待遇和特权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刘二人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能因此便说，刘少奇及其一伙就是“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而毛泽东的一派便不是。事实上，生活上刘反倒比毛要清廉自律，他没有毛的那些风流韵事。所以毛并不能以“官僚主义者阶级”构成打倒刘少奇的口实，更不用说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怀了。

甲：那毛为什么要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说法呢？

乙：我想，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

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一个不通之处。他恐怕人们会问：“你毛泽东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啦？”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现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按自己推理的需要，大作文章，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形。

甲：记得是陈伯达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太绕嘴，就给简化为“走资派”了。

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走资派”呢？

乙：这个“帽子”果然厉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给刘少奇，小号的可以戴给中学校长。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这样一来，连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没有中号的帽子？

乙：大多数就是中号的。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例，一位国务院的部长，可以算是个“当权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矿业学院去煽风点火，正在“大庆”蹲点的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

甲：张霖之属于钦定的“走资派”，应当算是个“典型”了，但他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

乙：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注：据文革时的揭发材料，张霖之在煤炭部确实推行过“计件工资”措施，把煤炭产量搞了上去，这是他作为“走资派”的一条“罪状”。——小鹰又及）

甲：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恨张霖之？

乙：其实，毛对张霖之的“业绩”或“恶行”有多少了解，或张是否与毛有什么“过节”，这并无关系。毛泽东那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

甲：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刘少奇说他不是“走资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这样，此乃“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毛这般定罪法，是不是个专制的“官僚”？这和斯大林动辄指人为“人民的敌人”，便予以枪毙，又有何区别？

甲：可是杨继绳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¹

乙：“官僚，官僚，官僚……”，“一言以蔽之”，就这样轻易地给刘少奇以及文革中所有挨斗的干部，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在内，都戴上了“官僚”的帽子，我想，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就抽象地推理和想象，说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²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

¹ 同前。

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究竟与群众又有些什么不可调和的“第一重紧张关系”？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杨继绳按照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甲：你这么一问，就不难看出那种美化毛泽东的说法之虚伪。他们深陷毛氏“文革思维”中不能自拔，反而努力揣摩毛的意思，说“他怀着深深的忧虑”来“反官僚特权”。而对于毛自己的问题，杨继绳却只用这样一句话就轻轻地打发了：“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¹

乙：多么堂皇的理由啊！但我想，不这么搪塞一下，杨继绳“文革反官僚”的文章恐怕就做不下去了。那好，我也不谈什么“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¹ 同前。

甲：是啊！那会儿有过这么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销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乙：记得大约是1964年，我也听说农村中有过这样一副春联：上、下联分别是“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横批是“社会主义好”。当时校方党领导告诫我们，这是恶毒讽刺“社会主义”缺衣(一)少食(十)，这是“阶级斗争”！但难道那不是事实吗？谁好谁坏，农民心里明白得很，毕竟横批不是“三自一包好”吧？

甲：问得好！当时这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反了贪腐和特权。

乙：现在很多人谈到文革起因，都笼统地以“官民矛盾”为基础。但是我要问，文革前夕我国“官民矛盾”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60年代台湾当局几度认为大陆遍布干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只要派人点火，民众必然“揭竿而起”，一举推翻共产党。但这并未发生。

如果说“官民矛盾”是文革的主要起因，而文教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那里的“官民矛盾”应当是很突出了。但我们那时都在大学，对那里的“官民矛盾”又有多少亲身感受？高教部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又怎样是个“官僚”了？那会儿清华的党干

师生不都是很拥戴这位蒋校长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甲：自61年到63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事实上，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就足以让人心情舒畅，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乙：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

甲：所以说，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乙：当然，我必需承认，杨继绳文章中提到“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问题，他讲的都对，而且“于今为烈”。但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顽固地要走他那条“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专制体制，他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相反，被杨继绳称之为“官僚集团”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道路，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反而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从大局上看，难道不是这样吗？尽管他们在细节上并

不像杨继绳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例如，他指斥刘少奇等人在谈论罗瑞卿自杀一事时，表现得“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¹，刘少奇在文革初也“贬损过梁启超、梁思成”²，但因此就都成了令人憎恶的“官僚”了吗？

甲：由这个“反官僚”的前提出发，杨继绳继续推理：“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于是他就得出结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³

乙：这真是一大“发现”！在他描绘的这幅图画中，似乎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超然地站在这三角形的顶端，好像他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那“左右逢源”的方式方法错了，结果竟“令人扼腕”：文革因为造反派没有革透“官僚”们的命而失败，才招致今日官场的腐败横流！

然而，如果笼统地说，“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权”——而官僚特权正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尤其在今天——那就会导致基本肯定文革，并且把毛泽东划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边，结果，他成了一位让人同情、怀念和拥护的“失败的英雄”。而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马屁居然可以这样子拍法，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都是限于从政治上来谈“谁才是‘官僚’？”的问题，并没有涉及“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但即使退一步，按今天人们对贪腐官员的概念标准来看，刘少奇既没有那些全国各地为毛修建的奢侈行宫和上亿的私人存款，也没有如毛

¹ 同前。

² 同上。

³ 同上。

派主将康生住的那种豪华宅第和私藏珍贵的国家文物，那怎么向他问罪才好呢？

乙：是啊，如果现在有人要把刘少奇打成是“特权腐败”官僚的代表，那恐怕就要“掘地三尺”来坐实他的“形穷实富”罢？

甲：现在还有人喜欢引用毛泽东 1975 年谈到“走资派”的话来批刘少奇，说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乙：毛说的那些批评“官僚”的话，“好房子，汽车，高薪，服务员”等，对毛自己和毛派都适用，怎么“官僚”都跑到刘派一边去了？毛派就个个清廉？此外，为了避免“穷究事情的本质”，毛也忘了提自己还有用特权霸占的“许多民女”和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获得“巨额存款”，刘少奇没有。……毛这样把“走资派”和“官僚”混为一谈，这是“忘我”煽情，还是把水搅浑好忽悠人？你懂得。

甲：值得注意的是，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天翻地覆》一书的第二十六章里，几乎不加任何批驳就大段列出毛在文革后期的荒谬言论，其中也包括刚才的那段话，最后他还动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一副很欣赏的样子，他是要把这些毛语录作为“政治武器”传给后人啊！

乙：这些人现在说起话来还是毛腔毛调，“鹦鹉学舌”地写文章。不过他们只学了前半句，为我所用，就大骂“官僚”，而对毛后半句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反动”？却不置一词，对“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一事，

也不作评议究竟谁是谁非？这就完全掩盖了文革的本质，明显地站到了毛派一边去了。

甲：所以，如果像杨继绳那样，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¹，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要问，如果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那它又是什么呢？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二、文革是什么？

提要：

- 文革是“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总爆发。
- 毛发动文革就是要整“走资派”。
- 杨继绳的“文革史”“偷换概念”。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

乙：如我前面已提到过，文革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 17 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甲：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

乙：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 23 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 16 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走资派”。

¹ 同前。

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题。

甲：也就是说，毛那时已明确意识到，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乙：一点不错。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甲：现在有一些文革学者质疑：“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们认为“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¹

那就请你谈谈刘少奇的路线是什么？他到底是不是个“走资派”？刘派有没有发号过与毛不同的政令？

乙：好！大家都知道，刚建国时，刘少奇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先搞些“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1951年土改之后，一些同志对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党内有人建议“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刘少奇立即批评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显然，他那时反对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完全是与毛强化“无产阶级专

¹ 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6月出版。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六七期。

政”，以及经济“集体化”、“国有化”等主张唱反调。

1955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被毛骂为“小脚女人”。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新党章中也略去了“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刘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甲：说到这“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我想起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几乎与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同时，铁托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虽其生活水准终究无法真正趋近于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过其他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

乙：是的，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

“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然而，后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

甲：对了！如果不健忘的话，当时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它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但文革中却被归纳上纲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又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乙：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走资派”罪行，都是正确的事，是好事！但按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来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刘少奇麾下有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组织部”、“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及各部委，党校和社科院，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门。1965年毛泽东要批《海瑞罢官》，在北京硬是推不动，别人就是不听他指挥，按毛的话来讲，彭真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结果他也只能到上海秘密地搞。总而言之，按毛的话来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甲：是的，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特别是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更是挺身而出，当着与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点出了毛泽东的错误。接着刘少奇又亲自主持了中央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如史称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等），具体地大幅度向“右”调整了毛泽东的各项政策，这也就是他说的“要退够”的意思。

乙：可惜，现在许多人都忘记了，或者干脆否认，这些当时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更不要说去重新判断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并追究理论分歧的根源所在了。

甲：而杨继绳的“官僚”论，除了上述“第一重紧张关系”之外，还需要引入新的因子，才能对这些上层政治斗争加以解释。他是把这些斗争归结为“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¹

乙：杨继绳用“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把文革曲解为一场“反官僚”的运动，现在又用这“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把它淡化为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由此，他把党内政治上重大的分歧，庸俗浅薄地归因为“‘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所致，从而否认了“路线斗争”中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可是，一旦进入“派系”、“山头”等人事、亲缘和历史渊源关系，他的理论就变得非常复杂，容许有无限多个待定参数来解释单个事实。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仅此一点，这个“唯象的”理论就显得很“拖泥带水”，远不及“反走资派”的“路线斗争说”来得“简洁和清晰”。应当说，“走资派”的问题，才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¹ 同前。

甲：是的，我最近看到北大的陈坡先生对毛发动文革起因的沉思录三十三，他指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史实：

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乙：的确，戚本禹当年的这篇“讨刘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文革中它“脍炙人口”，无人不晓。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

甲：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

乙：你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文革中不容刘有任何分辩，毛依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硬是把刘整死搞臭。时过五十年，有人来重建文革史，揣摩毛的心思，给刘戴上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那不就是要肯定毛文革的“宗旨”吗？怎么能这样地不顾历史事实？现有的材料都看不懂，不去分辨毛的指控，还需要找什么样的秘密档案来替毛开脱责任？这种“概念偷换”实在是替毛文革在作“善后料理”！

如果今后有什么文革文件要“解密”的话，我最想看到的，便是刘给毛的这封信，及

其对戚文“答辩”的原件。

甲：不过，“走资派”这顶帽子毕竟是毛泽东给他戴上的。刘少奇到底是否有过一个和毛的主张对立，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走资派”建国纲领呢？

乙：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生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甲：啊！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不过，今天来看，假如真按刘少奇的蓝图来搞的话，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

乙：可是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不通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妄想一步登天，反而失去了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机遇。

甲：那老毛真成了“老佛爷”了！但他与慈禧的“守旧”不同，毛是与其极“左”的方式，也成功地打压了一次“维新”尝试，扼制了马克思所期待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发展机会。毛和慈禧“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在这个意义上，毛自己才是“形‘左’实右”吧？他才是个历史的罪人！

乙：是啊，刘的那种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的建国蓝图，决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构想出来的。它没有照搬苏联或西方的作法，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具体可行。

甲：奇怪的是，杨继绳的“文革史”对毛、刘的这些重大分歧的史实，却只字不提，是因为不合他“反官僚”说的逻辑就故意略去了吗？

乙：我真希望人们由此能改变一点对刘少奇的成见，用理智战胜情感，以大我克服小我。

甲：你说的这些事实，应当是回答了前边提到的一些文革学者的质疑。

乙：刚才谈的主要是，“党内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关于“党内有没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我想再说几句。作为“当权派”，又没有发过“政令”，那就奇怪了。除了1962年的“西楼会议”、“广州会议”和“新侨会议”等在党内下达过与毛派不同的方针和精神之外，许多中央文件的发布都明显地有过争议和反复。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6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的转向和倒退。¹这文件的出笼折腾了三年，先后易稿几十次之多，其中的复杂与曲折、较

¹ 段恺：《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5/2015。关于“中央文件的争论和反复”，见邵荃麟：《关于〈文艺报〉“题材问题”的专论——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1960年12月5日）http://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ZGN.html。其中，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许多意见，后来都写入了《文艺十条》。这封信是文革初期张光年主动上交的。交信时张光年在原信上用红笔加了批注，还在许多文字下划了红线，指出他认为

量与苦衷，均不是现代一根筋的二杆子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即使如此，妥协后的《文艺八条》仍然受到文艺工作者的欢呼，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然而，在文革中它也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毒草来狠批。

还有，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于北京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会上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及“写‘中间人物’”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之下，坚持周恩来在“题材问题”上的文艺方针，与来自上海，秉承柯庆施“大写十三年”旨意的张春桥，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¹在1962年8月历时两周的《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主持人邵荃麟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所有讲话中，他只是引用了一句毛语录，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艺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²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干部。六十年代有关“文艺问题”的路线斗争还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它们是“文化大革命”毛、刘两派决战的前哨战。

文革前夕，这类不同政令的“暗中较劲”变得更公开化和白热化了。例如，“四清”时刘少奇根本就反对有“走资派”一说，64年底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重点要查干部经济上“四不清”的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

1965年1月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把“四清”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

的问题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邵荃麟划清界限。关于邵荃麟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见小鹰：《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时写作的？》（2014年11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date.html

¹ 小鹰：《从“大写十三年”到“向前看”》2012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bd_13&108.html

² 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谓“图穷匕首见”了！

真不晓得，说“党内没有两个司令部”的人，是否知道这些斗争历史？

甲：我看，问题主要不是在于是否知道这些历史事实，而是在于对刘少奇一派的“敌意和成见”等心理障碍，妨碍他们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

乙：一点不错！文革前，人们对“党内斗争”有多少了解？对刘少奇的主张又知道多少？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是在文革中被毛的“大批判”“洗脑”后形成的，至今还走不出来，这使他们认识不清楚“‘文革’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讨论一下几种典型的“偏见”。

总之，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有着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而且党内也的确是存在有两个“司令部”，在许多大事上主张“格格不入”，各自号令不同。所以说，文革是十七年来这些矛盾斗争累积的总爆发。

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提要：

- 文革反动了历史发展规律。
- 文革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甲：好，我同意你说的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的运动。那毛泽东发动文革来反对“走资派”，又是不是正确的呢？毕竟“走资派”的称号也让许多人反感、痛恨，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与“吸血的资本家”、与“腐化堕落”等道德败坏的事联系起来，那到底该不该反“走资派”？共产党不就是要推翻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吗？你为什么要说文革是反动的呢？

乙：文革这个运动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注定要失败。

甲：这怎么讲？

乙：简单地说吧，中国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实践就使我国人文和经济都陷于僵死的绝境，结果反倒是“封建主义”大复辟、“唯心主义”大泛滥。现在我们都知
道，文革的失败以及后来的社会实践都已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正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

甲：那你是说，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是来自马克思？

乙：是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前四个阶段的划分，看来大致是对的。按他所说，最后一个社会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时人类将彻底地解放了，人完全自由了！这是个非常美好的理想，可惜实现的难度太大。

甲：难度有多大？

乙：我想，除非经过像“从猿到人”那样的质变，现在丑陋的人类远不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社会体制，还不如说是对人类本身素质的一种要求。社会群体若没有这样的素质，这体制就不可能稳定。或者说，只有人类彻底摆脱了“罪的辖制”，得到完全的“自由”之后，才得以进入。这是后话，我们今天先不多谈。

甲：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它的一切苦难，从“封建社会”直奔“共产主义”呢？即使它很遥远。

乙：马克思认为不可以。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她“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正相反，马克思告诫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要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我只知道马克思一味反对资本主义，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见解！

乙：正是这样！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所有封建社会国家开过的一个“药方”，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先搞“资本主义”，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禁忌是：在这些封建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

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奇怪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后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甲：以前是否有人想过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乙：不但有，而且那些尝试都失败了。《共产党宣言》分析过的那些“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就是如此。马、恩写道：“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甲：马、恩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指的是什么呢？

乙：那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而这三个前提在封建社会里还正是尚待争取的。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这种著作(指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甲：这就是所有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失败的原因？

乙：正是这样。所以马克思嘲笑“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说：“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

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甲：对了，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但毛泽东和他们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他是否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

乙：还是不行！毛泽东等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可以不顾“物质条件”，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以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赤脚医生”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式的社会中，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毛泽东自诩的那一套“毛式‘社会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因“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尽管毛泽东“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和他的权术，“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但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历史证明他同样遭到了惨败。

甲：问题是俄国和中国当时又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乙：列宁的头脑一度是清楚的，他认识到，“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因此，列宁1905年在《两个策略》中曾指斥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囿。他写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

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后来列宁也搞过“新经济政策”，也许是被迫地，但因早逝，他没有能展开。

甲：那中国呢？

乙：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甲：这你有什么根据？

乙：关于这一点，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甲：那除了这党的共识之外，刘少奇有没有自己明确的说法呢？

乙：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

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今天看来，他的思想非常“高瞻远瞩”！建国初期，刘少奇讲资本家“剥削有功”，讲的其实也正是这个道理。文革中许多人“断章取义”，便愤愤然，以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五十年后，还有“才子”没有走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思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道理，还在以此贬损刘少奇是“自作孽，不可活”，连1945年的认识水准都没有，却有一副比毛更恨“走资派”的样子，真够可以的！

甲：应当说，共产党的这个纲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可是，后来呢？

乙：建国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甲：你这样说，是勾勒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框架。封建社会的中国可能的确是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后卅年来搞的“权贵资本主义”，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国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盗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现在人人痛恨它的残酷和不公，这种“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的？

乙：你说得不错。因为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上装作搞“资本主义”的样子，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这样搞下去，又把“实验”条件搞错了，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预言。

甲：你的意思是，所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不仅是要搞“自由经济”，主要还是指破除“专制和特权”，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

乙：对！也就是说，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就应当大大方方地搞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这里的规范化便是指：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之下，对政府和资本运作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和规章条例加以制约，包括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运作透明和公众监督等规矩，以及对金融和资本的必要节制手段。

四、结语

提要：

- 历史不在乎政治家的动机是“善”，或是“恶”，而着眼于政治家的主张是“进步”，还是“反动”。
- “走资派”不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
- “走资派”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而毛的“反走资派”则代表着历史的反动。

甲：我总结一下。这样看来，我们讨论文革到底是一场“反官僚”运动，还是一场“反走资派”运动？实际上，是关系到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的问题。

乙：正是这样。文革的“一大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摧毁了党内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假如现在我们把刘说成是个人人痛恨的“官僚”，那谁也不能替他说话。毛泽东拿掉了刘少奇，就是个“英雄”，文革的这条“宗旨”就应当肯定。然而，刘少奇要是如毛自己所指责的那样，是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那我们今天就可以

辩论一下。如以上讨论的那样，我们看到，马克思可以替他说话，历史事实可以替他说话，人民群众可以替他说话，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站立不住了，还有一大帮人也站立不住了。而共产党或许可以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彻底的改造和更新。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很要紧？

甲：是的，杨继绳等都是名人，他们“反官僚”的“文革观”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我们是极少数。但我以为，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而毛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了很多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资产阶级”已等同于“腐败官僚”，因此，这种“偷换”很容易迷惑人。

乙：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搞的“四清”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杨继绳等人说的那些贪污腐败现象，在那里都存在，民众每时每刻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村官”。而作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后来的毛文革则是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一场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从国家主席到小学校长，从党的干部到民主人士，从学术权威到普通知识分子，从科学家到资本家，从虔诚教徒到五类分子，以至从书画音乐到庙宇古墓，从瘦腿裤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会主义”的标准，全都“包圆”，叫做“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总之，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差别。

甲：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是刘少奇的“罪恶”，一些人还是持守毛对他“形左实右”的指斥，或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文革的头上去了，说他“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

毛，刘派反毛不反左”。——这种“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乙：所以，我们不赞同文革是“反官僚”一说。我们坚持文革的宗旨还是“反走资派”，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现在不管人们如何不喜欢刘派，他们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甲：但也有人强调，毛泽东搞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试错”罢了，甚至毛主导的“十七年”也是个善意的“社会实验”，免不了犯些错误。但毛毕竟对他一手建立的“官僚体制”不满，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主观上是要寻求对“官僚政治”的“变革”，尽管毛最终是要以“独裁政治”取而代之，这当然也不对。

乙：“试错”说也好，“实验”说也罢，无非是要说毛是“好心”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没有能克服“官僚体制”的弊病。既然“动机纯正”，而“试错”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所不可避免的过程，那毛“试”了一下，不成功，也就没什么可多被责备的地方了。——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颠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包含在那一个“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我以为，对于政治家，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他们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是“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肯定在封建专制、经济生产落后的中国里“走资派”们的主张，这也是众多民主党派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向往的建国道路。但他们和全国人民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了！人不是荷兰鼠，那是几千万个灵魂啊！谈论“社会实验”的人，不觉得自己太冷酷了吗？

甲：有趣的是，看来当年毛泽东自己也知道“走资”还是“走社”，这毕竟还是个“路线

问题”或“思想问题”。按以前党内多次对“路线斗争”的处理原则，这还是“内部矛盾”，定不了刘少奇的死罪。但毛自己心虚，恐怕日后刘会翻案，因此，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外，毛又在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最后给刘定的罪名还有“叛徒”和“工贼”，这就够上了“敌我矛盾”，所以要“永远开除出党”。后来查清楚，这些历史问题也都是毛派一手制作的诬陷。文革毛胜刘，“胜之不武”啊！

乙：可是，现在又有人想给刘少奇戴上“官僚”的恶谥，这比“叛徒”和“工贼”的称号更毒，因为其“模棱两可”、弹性很大，很难说清楚，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它又比“叛徒”和“工贼”要具体得多，也可恶得多。一旦刘少奇被戴上这项“莫须有”的“官僚”帽子，杀伤力极大，他在人心中真就是“永世不得翻案”，而“走资派”连同整个“资产阶级”也跟着臭不可闻了！

甲：是的，这些人用“反官僚”来取代“路线斗争”，其结果就是做了毛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实可谓“用心良苦”啊！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明君整肃贪官”的事，也不是没有单纯为地位、为性命、为财富、为女人的“宫廷格斗”，但是，现有的历史事实支持毛、刘“政治路线斗争”的说法，这也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本人的看法。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

乙：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解放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之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义专制”的国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因

此我们说，刘少奇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而毛泽东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甲：是啊！文革的头两年，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然后毛派有八年的时间，做了一切凡能想到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要“改造这‘旧世界’”，结果又如何呢？最后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跑了，只剩下“孤家寡人”和他的“四人帮”，还留下了一个“捉襟见肘”、“民怨天怒”的烂摊子！“无政府主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泛滥成灾，哪里有他梦想的什么“天下大治”？

乙：可见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违抗的。

甲：去年三月，著名学者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他曾这样谈到了国内对“毛刘之争”说法的演变：“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邓小平只提到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并没有上到路线错误的纲。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他也只是含糊地提到‘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仍不敢明确地说是‘两条路线斗争’。

1993年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承认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你现在甚至不用“错误”和“正确”来表述，而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直接用“反动”和“进步”的词语，来评价毛刘两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可以说，这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突破。

乙：从根本上搞清楚毛式“社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早就该做了！我们探讨毛刘政见之争，把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为了去毛化，也就是说，把他披在身上

的假“马”皮剥去，“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附在秦始皇那具僵尸上去了。不过，现在有人还在否认有“路线斗争”，不分“青红皂白”，把刘和毛放在“一锅煮”；或者干脆把刘派当作“官僚”来打，那更是“颠倒黑白”、转移目标，帮了毛的大忙。这些人的公知身份很有些影响力和迷惑性，所以，我要特别说清楚。

甲：看来，现在人们应当为“走资派”正名了。

乙：是的，共产党内是有许多封建专制的“官僚”，包括毛泽东自己及其“四人帮”在内，他们“草菅人命”、腐败堕落，而现在还有更多。但“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并不是很多官员能够配得上“走资派”这一光荣称谓的。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甲：另外，我看现在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也不配叫做“走资派”。他们只有“资本主义”的“躯壳”，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说的构成“资本主义”的那三要素，¹而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

乙：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们现在谈论“官僚”和“走资派”时，最好做一点区分，不要为了煽情或出气而“一锅煮”。

¹ 小鹰：《“概念”六日谈》，《记忆》209期，12/31/2017。亦见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1/2017，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

甲：好！今天我们讨论文革，谈到了刘少奇和马克思，这是些很有争议的题目和人物。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当年紧跟“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现在要他们否定自己做过的事，非常困难。

乙：不错，人总是批判别人容易，要否定自己？——难！正如德国学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所说，“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¹现在有些人“红卫兵”情结未了，造反派块垒难消，论说起自己当年介入过的那些“豪迈”事来，总有许多“不过”、“然而”等转折用语跟随，而“反官僚”一说，说到底，目的还是要设法肯定自己当年的“正当性”。

甲：你这“异类”的挑战，恐怕会得罪不少“精英”哩！

乙：没关系，我只是更欣赏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一句题辞：“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我希望我们的讨论至少讲清楚了一件事，就是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发展规律而动的。其余的事，各人自己去想罢！——欢迎批评。■

2016年1月初稿，2018年1月修改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

（编者说明：此文各节均有微信版）

¹ 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九七期。

【子夜谭】

必须守住真正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何與懷

根据日前网上流传的电子版图片显示，一本中国全国学校已沿用十八年的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教科书将被取代，而在由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新版中，“文革十年”一课与毛泽东的“错误”将从此消失。

他们是怎样处理的呢？新版教科书删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课后，文革的有关内容被轻描淡写并入旧版“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课，在新版中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对于文革原因，旧版教材说：“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将“错误地”三字删去，将“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表述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另外，小标题“动乱和灾难”也被删除。而在论述文革影响时，新版添加了新的为其圆场的说法：“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这种改动，自然引发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首先，这显然违背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决议》已经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其实，当年《历史决议》已经是一个妥协产物。1980年秋，邓小平指使手下按照他“宜粗不宜细”方针弄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让四千高级干部进行大讨论，说要“实事求是”，

要让大家“满意”。他这个方针就是文过饰非掩盖历史，虽然否定文革但不否定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然而，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会议出现群情汹涌的评毛批毛的“严重”现象，许多参会人员甚至要求重新撰写决议草案。最后为了保住毛泽东那面“旗帜”通过了这个“决议”，也就顾不得什么“实事求是”了，更顾不得什么“群众满意不满意”了。

现在，连这个已经记入党史的《历史决议》也不顾了。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看，毫无疑问，十年文革是一场反人类反人性的大劫难。四人帮被抓之后，时任中共副主席的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这些统计数字没有反映文革对中华民族那种无法计算的、长远的、深层的创伤，然而也够骇人听闻的了。现在，有关当局居然将十年文革浩劫美化为“艰辛探索”，这不但是不伦不类、荒唐轻率，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又一次犯罪！人们说得好，从小处看，这种淡化文革、为毛开脱、刻意遮蔽历史真相的做法，不仅无法被世人接受和信服，而且会走向反面，激发民众的怨气怒气，使得本就脆弱不堪的公信力再遭折损；从大处看，这样的做法，与大国应有的气度相去甚远，也暴露了深度的不自信。

如前文所示，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罪行，并没有完全清算，所谓“彻底否定”，不过是纸上谈兵。这就留下后患。最近这些年，中国出现一股舆论潮流，有人在留恋文革，试图复活文革，其中有些人是相信它，也有些人是利用它来做文章。时至今天，出现中学统编历史教材被改写事件，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可见这股潮流绝对不可等闲视之。有关当局不是曾将许多学者要求“还原历史”、“重写历史”的主张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而加以讨伐吗？然而，就这个事件便可请问：究竟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呢？

这应该是常识：要杜绝历史虚无主义生根发芽，起码就得将历史原原本本呈现出来，不能歪曲，不能蒙蔽。关于文革，其实现在更应该敞开一些历史档案，允许研究者自由研究这段历史，或者如巴金期待的那般尽可能多地建立文革纪念馆。如果有什么新时代的到来，那么，所谓新时代，必须以对历史坦荡荡的姿态作为底色之一，要让民众知史明史，

这样自觉自识地形成的价值判断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不反思历史就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而论之，这里的“历史”，不仅包括文革，也应该包括其他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反右、六四，等等。如众多论者所指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才有助于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才能避免再犯错误。特别是执政者，如若自己尚且没有勇气和底气直面历史，还扯谈什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何以要求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直面历史？

历史乃是国民集体意识和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所谓“灭人国者必先灭其史”，没有全面而又真实的历史记忆，一个国家和民族必然无所依傍，其集体意识必然瓦解。文革记忆血泪斑斑，历历在目，岂容青史尽成灰？！我们必须永远铭记这个民族惨剧，守住否定文革的底线，而且要真正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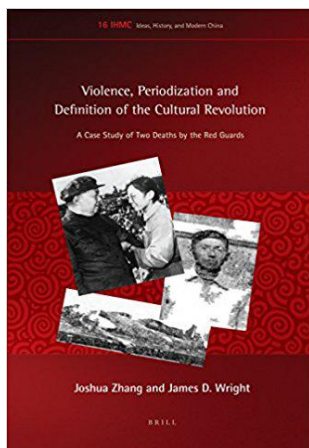
2018年1月11日

【读书】

文革暴力、分期与定义

——兼谈定量分析法在文革研究中的运用

乔晞华



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译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 一书于2018年1月由 Brill Publishers 出版了。该书的作者是 James Wright 教授和乔晞华博士。

该书从发生在1966年的两起学生打死人事件出发（即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卞仲耘案件”和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九二八王金事件”），对文革中的暴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对文革的分期和定义展开了讨论。该书对文革研究学界中流行的“一

个文革说”，“两个文革说”及“社会冲突论”进行了批判。在批判中，该书不仅结合社会运动学的理论，并采用了定量分析的结果来支持立论。

定量分析法是通过采用基于数学（特别是统计学）方法对收集的数字型数据进行分析来解释现象的研究方法。而定性分析法是用参与者观察法或个案法的研究方法，获得对某一事物或情景的讲述或描述。用通俗的话来说，定性分析是与文字打交道，而定量分析是与数字打交道。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第一个区别是，前者的主观性较大，后者的客观性较强。由于文革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主观性较大，对事实可以各取所需，所以容易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例如在谈到文革中毛是否掌控全局的问题上，有的学者说毛自始至终掌握全局，玩民众于股掌之间。他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也有的学者说毛不完全能控制得住，他也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支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可以对事实各取所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得到一致的意见。而定量分析法力图减少主观性，强调客观性，所以有它的优越性。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第二个区别是，前者强调特殊性，后者强调普遍性。所以定性分析的结果一般不能用来推论到总体。例如，研究者找了一些文革的参与者谈了文革的情况，不能据此得出对文革总体的结论。研究者只能说，有可能是这么回事，有待进一步证明。定性分析法特别适合于探索性和开发性的研究。有人把定性分析比喻作为研究的侦察兵，而定量分析是歼敌的大部队。

从目前文革研究的状况来看，发表的定量研究的论著和致力于定量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有学者说，国内过去关于文革的研究多重于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不能不说是个遗憾。¹该书试图有所突破。本文介绍该书中的几个定量分析的例子。

陈佩华等人于1980年对广州的中学红卫兵的派别选择和家庭出身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得到以下的结果（因原文中只提供了百分比，以下数据是作者根据原文复原的，可能存在四舍五入的误差）：²

表 1. 广州中学红卫兵派别选择与家庭出身关系

¹ 卜伟华。2009年。“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文摘增刊》第724、727期。

²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派别	干部	工农	非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黑五类	合计
造反派 (红旗)	55 (19%)	181 (34%)	121 (40%)	405 (61%)	143 (36%)	904 (41%)
保守派 (东风)	208 (73%)	215 (40%)	30 (10%)	46 (7%)	17 (4%)	516 (24%)
未参加派 别	22 (8%)	141 (26%)	151 (50%)	214 (32%)	239 (60%)	767 (35%)
合计	285 (100%)	537 (100%)	302 (100%)	664 (100%)	399 (100%)	2187 (100%)

从上表可以看到，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简称为“红类出身”）参加保守派（即东风派）的居多，而其他类的学生（或“非红类出身”）参加造反派（即红旗派）的较多。例如，73%的干部子弟参加了东风派，而只有4%至10%的非红类出身的学生参加了东风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成份不好的学生参加派别比成份好的学生要少。例如黑五类的学生有60%没有参加任何派别，而未参加派别的干部子弟却只有8%。

可是，仅仅这样分析是不够的。因为上述差异可能是抽样误差所致。现在的问题是：以上的描述性统计是否是由于抽样误差造成的呢？非常遗憾的是，陈佩华等人当年仅停留在描述性统计，并未对这一数据进行推论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仅展现事实，结论还得由研究者或读者自己做。而推论性统计却能帮助研究者做出推论性的结论。

根据该书作者的计算，上表中的关系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chi^2=790$ ， $L^2=759$ ，8个自由度， $P<0.00001$ ）。一般来说，P值小于0.05即可认为差别有显著意义，P值小于0.01即认为差别非常显著。如果仅看学生是否参加派别与否，5大类学生之间的差别也存在着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别（ $\chi^2=252$ ， $L^2=270$ ，4个自由度， $P<0.0001$ ）。以上的推论性统计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广州中学红卫兵派别抉择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不容忽视。当然这一关

系在北京¹和南京²等地遇到了挑战，如何解释广州与北京等地的不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该书还采用了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和隐类别分析法（Latent Class Analysis）对建国后发生的 38 个运动进行了分类。完成这一分类需要分类指标。在这里我们用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指标”的作用。医学界测定病人是否患有乙型肝炎病症通常用两对半指标：即表面抗原（HBsAg）和表面抗体（抗 HBs 或 HBsAb）、e 抗原（HBeAg）、核心抗原（HBcAg）和核心抗体（抗 HBc 或 HBcAb）。每个抗原或抗体分“阴”性和“阳”性。共有 32 种可能的组合，其中常见的有 9 种组合。如果 5 个指标全是阴性，说明过去和现在未感染过乙肝病毒。如果 5 个指标分别是“阳-阴-阴-阳-阳”，俗称为“小三阳”，说明传染性弱。如果是“阳-阴-阳-阴-阳”，那就是常说的“大三阳”，是急性或慢性肝炎感染，有极强的传染性。这 5 个指标为诊断乙肝病症提供了方便而又实用的定量依据。同理，我们可以用相关的指标来区分运动的类别。该书使用了以下 7 个指标来区分建国以来的各种运动。

表 2. 分析运动的 7 个指标

编号	抽象概念	具体指标
1	运动的目的是	改革现有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
2	运动的自主性	由各级党组织高效控制？
3	运动的自发性	运动中民众成立草根组织？
4	中共对运动的政策	高层态度一致？
5	运动的对象	矛头向下？
6	运动的结果	运动积极分子受迫害？
7	运动性质	是整人运动？

通过使用 SAS 统计软件和相关的插件³计算，得出以下的分类：

¹ Walder, Andrew. 2012.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²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2011.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pp 425-427.

³ SAS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是统计分析系统软件，广泛运用于教学、科研、企业和政府部门等。Lanza, S. T., Collins, L.

表 3. 建国以来运动的分类

类别	运动
1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二月镇压、一打三反、清查 5·16、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取缔法轮功
2	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大跃进、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上山下乡、五讲四美、三讲、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保持先进性、社会主义荣辱观、创先争优、群众路线
3	文革造反运动、王金事件调查运动、全红总运动、1976年4·5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1986年民运、1989年民运、美国黑人人权运动

第
1 类
运 动
显 然

属于“斗争运动”，或者叫做“整人运动”。第 2 类运动属于“思想教育/生产建设运动”。第 3 类运动具有民主运动性质。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作为参考放入模型中分析。“全红总”运动要求提高改善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地位和待遇，与党的整人运动、思想教育/生产建设运动风马牛不相及。文革的造反运动属于第 3 类，即民主运动。这一结果支持“人民文革”的说法，说明“两个文革说”有一定的道理。文革中亿万民众参加的群众运动与其他中共领导的党的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

该书还采用假设检验的方法，对文革的定期进行讨论。从建国以来党的运动可以了解中共的政策，并可对文革进行分期。以下是分析的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

表 4. 建国以来中共运动的频率

	第 1 时期	第 2 时期	第 3 时期	第 4 时期	

M., Lemmon, D. R., and Schafer, J. L. 2007. PROC LCA: A SAS Procedure for Latent Class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4 (4), pp. 671-694. The Methodology Center, Penn State. SAS Procedure LCA & Procedure LTA. <http://methodology.psu.edu/>

运动类型	(P1)	(P2)	(P3)	(P4)	合计
	1949-1966	1966-1968	1969-1976	1976-2016	
非斗争类	8	0	0	9	17
斗争类	5	2	4	2	13
(百分比)	(38%)	(100%)	(100%)	(18%)	(43%)
合计	13	2	5	11	30

表4中括弧内的百分数是各时期斗争运动的比例。从上表可以看出，文革前斗争运动占总运动数量的38%，文革后则只占18%，仅是文革前的约二分之一。文革前3年（P2）与后7年（P3）的比例是各时期中最高的。以下是检验各时期运动频率是否有显著性差异的结果：

表5. 不同时期的显著性差异检验

检验 Test	时期	χ^2	L^2	Fisher's P	自由度
1	P1, P2, P3, P4	10.81	13.30	0.008	3
2	P1, (P2+P3), P4	10.81	13.30	0.004	2
3	(P1+P2+P3), P4	4.47	4.76	0.035	1
4	P1, (P2+P3+P4)	0.22	0.22	.721	1

由于样本很小，通常的 χ^2 和 L^2 不宜作为依据，在这里采用Fisher Test（即费雪尔精确测定）。结果告诉我们，4个时期的斗争运动出现的不同频率（检验1）并非出于偶然（出于偶然的机率是千分之八）。直观地说，文革前和文革10年比文革后的斗争运动要多得多。

检验 3 告诉我们，文革前、文革时期与文革以后的时期，整人运动的频率有着显著差别。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说法在此得到证明。

现在的问题是，文革前 3 年（P2）和文革后 7 年（P3）是否可以合并作为一个时期。换言之，文革是否是 10 年？该书采用了 Duncan¹提出的方法对以下的 3 个假设进行检验。

表 6. 不同时期的合并的检验

检验 Test	比较	Δx^2	ΔL^2	自由度
A	Test 2 - Test 1	0.0	0.0	1
B	Test 3 - Test 2	6.34	8.54	1
C	Test 4 - Test 2	10.59	13.08	1

(注: $\Delta L^2_{ij} = L^2_j - L^2_i$, $\Delta \chi^2_{ij} = \chi^2_j - \chi^2_i$)

检验 A 说明，文革应为 10 年，前 3 年与后 7 年中，中共的整人政策并未发生变化，仍以整人或阶级斗争为其主要政策。这一结果支持“一个文革说”，说明该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检验 B 说明，文革前与文革 10 年期间也有显著差异，文革中整人更加厉害。文革前 17 年是文革的前奏，而文革是文革前 17 年的继续也在此得到证实。检验 C 说明，文革后与文革时期有着显著性的差别，不可混为一谈。直观地说，文革后的整人运动比文革时期和文革前要少多了。中共自文革结束后调整了政策，基本结束了整人运动，其显著性在此得到证实。

以上的几个检验分别支持“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说明两个学说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支持一个学说也意味着反对另一个学说。从负面的意义上看，同时支持两个学说也意味着同时反对两个学说。换言之，上述结果意味着两个理论均存在缺陷。该书对上述结果的意义和文革的定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次就不赘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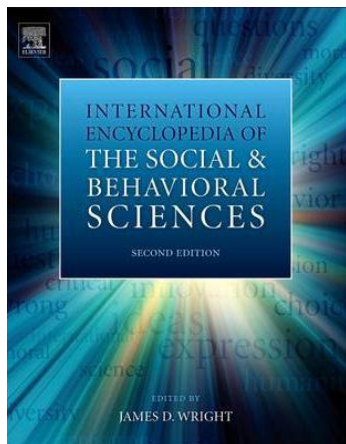
¹ Duncan, Otis Dudley. 1975. "Partitioning Polytomous Variables in Multiway Contingency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3), pp. 167-182.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定量分析法的最重要的优点是其“可重复性”。对于书中得出的结论（如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是民主运动，文革是10年而不是3年），目前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但是，只要采用书中的指标和相关的统计学模型，任何人都会在任何一台计算机上，利用任何软件得出相同的结果。该书的作者呼吁学者们能够在文革研究中更多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推动文革研究的深入发展。■

作者介绍：



James Wright 教授是位美国知名的社会学家，任教于美国的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是该校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所主任。他曾任教于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1973-1988）和 Tulane University（1988-2001）。他曾担任美国著名学刊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的主编长达36年（1978-2014）。著有27本论著，300多篇学术论文，是贫穷问题、无家可归问题、婚姻问题、控枪问题专家。他还是全美 Horowitz 基金会的公共政策董事会董事，并担任国际著名的 Scopus 摘要和引文数据库社会和行为科学专题主席。



他的学术代表作包括：主持编辑了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s 1-26* 《国际百科全书社会和科学类 第1-26卷第2版》（共23,185页），*Under the Gun: Weapons, Crime, and Violence in America* 《枪口之下：枪械、犯罪和暴力》，*Drugs as a Social Problem* 《社会问题：毒品》等。

近年来，James Wright 教授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在著作中讨论过中国的旅游业对改变贫穷的作用，中国保护古迹的努力等问题。James Wright 教授是位正直敢言的学者。他曾因力挺一篇关于同性恋家庭的子女成长不如异性恋家庭子女的论文而饱受争议。这是同类论文中第一篇基于全国

性大数据的定量分析论文。同性恋群体对论文的作者和力主发表该论文的学刊主编 James Wright 教授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其中不乏难堪的人身攻击。美国的多媒体和个别学术协会也加入了“围剿”行列。这一情景与当年的关于离婚对子女成长负面影响之争如出一辙。女权主义人士坚持认为，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利大于弊。学术界受此压力，少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其错误，不同声音的论文论著才得以面世。令人欣慰的是，在同性恋子女教育问题上，学术界不乏有正义之人。美国的 37 位社会科学教授联名写信公开批评媒体和学术界的压制异见的不正之风，公开力挺论文的作者和学刊的主编。James Wright 教授坚持认为，学术不能受政治左右，不能因为其结果不受欢迎而扼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批评研究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研究结果令人尴尬而否定论文本身。

作者介绍：



乔晞华，南京外国语学校 1968 届初中毕业，1989 年赴美留学，1992 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6 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美国某州司法部研究人员。主要著作：《西方社会学面面观》(2013)；《总统制造——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2014)；《傲慢与偏差——66 个有趣的社会问题》(2015)；《多棱镜下：中国的电影与时装、时尚》(2015)；《即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2015)。



《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记忆》156 期）《试论文革中的群体理性——兼谈“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记忆》160 期）。乔晞华的《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在《记忆》上发表后，得到了读者热烈的反响。清华大学老五届孙怒涛、北京中学老三届王伟等来信称赞此文。（详见 157 期、158 期读者来信）。■

【读书】

聂元梓与安子文“特务电台发报案”

余汝信

2017年10月，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署名聂元梓的《我在文革漩涡中》一书，此书可视为聂元梓的第二本纸本回忆录。

《我在文革漩涡中》共959页，其中真正属于聂元梓本人的回忆部分392页，占全书篇幅的41%，其余567页为文献和附录，占全书篇幅的59%（对于一本回忆录来说，该书正文与附录部分的份量其实有点儿本末倒置）。与2005年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首版纸本《聂元梓回忆录》相比较，新版回忆录删除了聂到北大前的经历部分，同时删除了旧版回忆录第七章“小家庭骤起大波澜”全章。

本来，聂元梓的新版回忆录编著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对旧版回忆录的增删，都是其应有的权利，外人毋庸置喙。惟我们需要指出且可以评论的是：新版回忆录将旧版中的第七章全章删除，致使新版中“与康生、曹轶欧的纠葛”一节严重失真，缺失了文革初期聂与康生、曹轶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关于这重要一环，让我们重温一下聂在旧版回忆录中是怎么说的吧。

一、聂元梓称“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小家庭骤起大波澜”一章中，聂元梓称，“1965年的深秋，我和老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了婚。”“当时，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里去，有时候在一起聊天，有时候几个人打打麻将。”“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

聂又称，“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们也认识了，他很好。”

这里，聂元梓搞错了！邓觉先的丈夫不是共产党人张仲瀚，而是民主人士张振汉。聂的第一本回忆录曾经过笔者的过目修改，惜笔者当时也未能觉察聂元梓在此其实是摆了一个大乌龙！

直到2009年后笔者才得知：

张振汉，1893年生，江苏徐州铜山人。职业军人。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4月23日任国民革命军第41师师长。1932年与邓觉先结婚。1935年4月授中将衔，6月在湘鄂西围剿红军，在忠堡之战中负伤被俘，参加红军，并任红军学校战术教员，随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抗战爆发后回到国统区，194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5年11月至1947年4月任江苏连云港市长。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历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湖南省政协常委，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6年秋，张振汉、邓觉先及儿子张天佑一家三口离湘北上，1957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下住进了北京西城丰盛胡同38号宅院。1965年初搬到了西四北三条报子胡同里的小绒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¹。

聂元梓接下来称：

交往多了以后，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比如说，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中央组织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有时候，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时一些老同志

¹ 见张天佑、陈贤庆、黄自荣：《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找他谈工作，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关意见，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它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两个人的办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却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不关心这些事情，即使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上。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领导，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邓觉先年龄不算小，自称五十岁了，经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这在当时都是让人反感的。党的工作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来做？

我和他们渐渐熟悉以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暧昧关系就不在乎我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多了。有一天，几个人约好上邓觉先家里打牌，吴溉之一时去不了，要四点钟才能到，吴溉之就让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刘某某，邓觉先，加上我，正好一桌。我们四个人就坐一辆车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三个人在车上嘀咕家里的什么事情，开始我没有太注意他们说些什么，后来就听到刘某某发脾气了，她说：“这个家我管不了，你让邓觉先管吧！”没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说，邓觉先你就管吧。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刘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

随着了解加深，我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自己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这些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

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说，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什么关系，和什么人好，都瞒不过我们司机。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相互认识，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那位领导给她找的。这位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子文了。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别人说，我就跟吴溉之说，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吴溉之说，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说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你为什么不早提醒他？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

这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身份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子文。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电话来，说中监委要开会。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邓觉先，说去不了了。可随后又接到通知，说会议改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

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¹

二、聂元梓向康生检举安、邓

当其时，安子文是有妇之夫，邓觉先是有夫之妇，他们俩人的关系，在旁人眼皮底下是否如聂元梓所述般如此暧昧有加，不堪入目？聂所述是否仅为一面之词？今日已难以查证。惟我们知道的是，无论如何，聂元梓已经开始了她自己所称的检举行动了！

聂元梓首先将她对安、邓俩人的怀疑，告之密友杨惠文，杨的丈夫白介夫（时任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也从中得知其事。夫妻俩十分紧张，杨劝聂离婚，白非得要将此事报告所在单位中科院的保卫部门，并关照保卫部门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汇报。聂随后又将此事告诉了她认识的老同志郝德青（原中国驻朝鲜大使，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认为，“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聂说康生不好找，郝说，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蹲点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²

有关向康生检举安、邓的整个过程，聂元梓自己称：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保卫部门，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

¹ 《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页95—99。

² 见《聂元梓回忆录》页102。

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

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正所谓‘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我就琢磨着怎么写这个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了，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时间是在‘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前。后来，关于邓觉先这件事，我给康生还写过两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在六月初写的，主要内容是说，毛主席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怎么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就向康生报告了。两张条子都是经过曹轶欧传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

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¹

这里有一个疑问是：曹轶欧等人到北大调查是秘密进行的，当年的资讯也很不发达，郝德青与曹轶欧、康生又都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他怎么会知道曹在北大“蹲点”？笔者推断，曹到北大，应该还是聂告诉郝德青的吧？

在旧版回忆录中，聂元梓称，“在我的记忆中，曹轶欧到北大来的时间比较早，大约是在当年的四月份左右。”“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有一天，曹轶欧派人通知我，要我到专家招待所去见她。曹轶欧告诉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是应该继续解决。”故此，聂是知道曹到北大调查而且见过曹的，郝德青却大多不可能知道。

据曹轶欧带领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刘仰峤的回忆，曹轶欧和他是1966年5月14日到北大的，在专家招待所只住过一个晚上，以后就住在西颐宾馆。²而《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亦确认曹轶欧等人到北大是在5月14日。³

由此可以推断，聂元梓旧版回忆录中有关向康生检举安子文、邓觉先的时间有误，不在1966年4月而应是在当年的5月14日之后。惟检举的举动却确有其事。

¹ 《聂元梓回忆录》页102—103。

² 王效挺、黄文一：《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之商榷》，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页19。

³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页642。

三、聂元梓检举的后果

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被“打倒”。据一位参加当晚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大会的中组部干部日记记载：“晚上，到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参加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有陶铸同志、曹轶欧同志（康老的夫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调查组组长）、中监委钱大姐。部的安子文、李楚离、赵汉、帅大姐、乔明甫、陈野萍、杨以希等，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会场气氛极度紧张。”“在打倒安子文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声中，陶铸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天的会是很好的大会，是揭盖子的大会。……’‘组织部的问题是严重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你们的问题是党不管党，独立王国，不是一般问题，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曹轶欧和钱瑛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曹轶欧说：‘中组部的盖子揭开了，安子文的问题揭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¹

安子文八月中被打倒，与聂元梓的检举似乎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与聂有关的，是安子文其后的一大罪名——“特务电台发报案”。

在安子文被审查后，从他家里搜出一部曾当作收音机使用的英制旧电台。这是彭真于1948年经贾震送给安子文的。安子文在河北平山南庄和北京解放初期曾当收音机使用过，后因零件严重损坏而搁置。被搜出后经有关部门鉴定，认为零件严重损坏，是不能用来发报的。惟在安子文家搜出此发报机后，中央专案小组编造了一个“特务电台发报案”，牵连涉及与安子文有工作关系的多位高级干部及安的家属，张振汉夫妇全家受到牵连。安子文本人则在其后被正式逮捕，被带上手铐，投进秦城监狱。²

1966年8月22日，邓觉先、邓觉慧姐妹俩与张振汉夫妇的儿子、在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天佑同时被捕，并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各自单独囚禁。12月，原在家中被软禁的张振汉也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

¹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自印本），第一卷，页91。彭健飞，时任中组部第五处负责人。

² 见陈野萍、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页196-197。

中央专案组认为，张振汉一家（包括邓觉慧）是冒充的一家人，是一群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具体的活动，是利用安子文家的电台，由张天佑进行“特务发报”。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安子文等人被指为“叛徒”。

5月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工作人员时，谈到了安子文与邓觉先等的关系并表扬聂元梓称，“中组部实际上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安子文与一些特务邓觉先，张××¹、邓觉先的妹妹等人的问题，组织部的同志应该是首先察觉的，但这件事我比你们知道得早，……这件事是聂元梓同志在五月二十五日，她贴第一张大字报以前就告诉我的。据监委的同志说，有人向监委报告过，被钱瑛压住了。同志们想一想那样的一个特务，怎么能自由出入中央组织部？同志们的革命警惕性那里去了！？而且不是一个短时间，从五五年就开始了，已达十一年之久，特务分子在安子文家里如同家庭成员。同志们想一想，难道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我们共产党员的政治警惕性到那里了？！许多秘密，同志们不知道，安子文却及时迅速地告诉了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这说明对安子文叛徒集团，同志们的揭露，批判做得不够。”²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亦表扬聂元梓称，“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功劳：第一张大字报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³

10月25日，康生在京西宾馆接见中组部和中监委工作人员时，再次谈及安子文与邓觉先关系及安家中的电台称，“同志们要警惕，安子文不仅是叛徒，混进党内到底干什么？为什么和特务分子那样密切？和邓觉先、邓觉非[慧]那样密切，而且是长期的，就是因为安子文有电台。安子文的电台还由陆定一的弟弟特务陆根一修理过。要警惕，有少数坏人混进来。内蒙王逸伦就是特务。安子文是不是有现行特务活动很值得怀疑，所有的秘密先

¹ 原文如此，应指张振汉。

²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一卷，页396-397。

³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二卷，页571。

告诉邓觉先，为什么？”¹

四、结局

聂元梓在旧版回忆录中有所反思地称：

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以及有些事情处理不当，违背组织原则；不太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邓觉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说的那样是什么英国特务。

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当时杨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以为邓觉先是“特务”。在“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这种氛围里，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搞混了，过分单纯的头脑把事情想得过分复杂了。虽然出发点是保卫党的纯洁性，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不但当事人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波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至于康生把这件事情无限扩大，整人，那是我当时始料不及的。

可惜，以上这一段检讨性的语句，在新版回忆录中连同“小家庭骤起大波澜”全章被完全删除了，好像历史上不曾发生过这件事。

现将聂元梓所不了解的张振汉一家后来的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张振汉于1967年5月26日在秦城监狱中病故。邓觉先在被关押审查期间于1971年2月17日病故。张天佑于1969年6月30日结束两年零十个月单独监禁的生活，回到原单位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接受改造”。文革结束后，历任北京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代分离纯化技术实验室主任等职。

1979年11月8日，国家测绘局为邓觉先召开了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大会，局领导在会上宣读的《关于邓觉先同志的平反决定》称：

¹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二卷，页624。

邓觉先，又名邓道生，女，汉族，1915年生，湖南长沙人，1955年参加革命工作，原国家测绘总局资料员。……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怀疑邓觉先同志有特嫌问题，于1966年8月22日将其逮捕审查。邓觉先同志在被关押审查中，于1971年2月17日病逝。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在1975年5月6日对邓觉先同志的审查结论为蒋匪内政部调查局的特务，混入我内部的特务分子。经复查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挠和破坏，对邓觉先同志残酷迫害致死，并作了错误的审查结论。现决定：一、给邓觉先同志平反昭雪，撤销原审查结论，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补发逝世前的工资。二、召开邓觉先同志平反昭雪大会，骨灰盒安放到革命公墓，按规定给家属补发抚恤金，给其原供养的母亲沈裕君发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三、邓觉先同志的亲属子女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要按照党的政策改正过来。

国家测绘局

1979年11月8日¹

据新华社1980年1月31日电，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仇鳌、楚溪春、黄雍、张振汉、康心之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由王首道主持，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悼词。悼词说，“张振汉同志是江苏省徐州市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军队师长、指挥等军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工农红军作战被俘，即留在红军中工作，并随军长征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党组织送回国民党统治区。一九四九年曾为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做过一些工作。解放后历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悼词并称张振汉等为“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²

张振汉、邓觉先夫妇泉下有知，可瞑目矣！■

¹ 《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页243-244。

² 《人民日报》1980年2月4日。

【读书】

为历史作证

——再读《平原上的歌谣》¹

陆凌

七年多前的那个春天，偶然在阳光卫视上看到对于刘庆邦的专访，其中谈到此书。急急地从当当网上购得，用了三周时间，眉批旁注都很少写，算是一气读完，感到十分震撼，也非常兴奋，“国内第一部详细描写三年大饥荒的长篇小说”，名副其实，竟然顺利出版了。当时，就有给作家写信的想法，提笔又放下，终于没有写。今年深秋，再读此书，约两周读完，依然震撼，感触良多，阅读时写下不少随感，无论如何，这篇读后感该写了。

政治环境依然恶劣，政治气候依然严酷，对于三年大饥荒的研究，依然无法公开全面深入地展开，也许迄今为止，这本书还是国内正式出版发行的唯一一部以三年大饥荒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仅从这一点来看，《平原上的歌谣》就值得反复吟诵。虽然，对于历史的揭示，尤其是那段秘而不宣的痛史，以小说的手法进行揭露，显然是不够严谨，甚至是十分不妥的，毕竟普罗大众对于三年大饥荒缺乏基本的认知，哀婉凄楚的文学描写，对他们而言，反而容易失真，认为是作家的想象创作艺术发挥，只是一个遥远的、虚幻的故事而已。但是，作家以亲历人的身份，用准确细腻的笔触，详详细细地描述那段饥荒岁月的方方面面，认真而执着地诉说自己苦难的家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平原上的歌谣》写的就是文凤楼村的饥荒史，如果没有猜错，文凤楼村就是以刘庆邦的故乡为原型，是河南沈丘县某一个普通的乡村。

下面，我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对于文凤楼村的饥荒史做一个梳理，所用信息、资料完全采自本书，我把刘庆邦想象成一位采访对象，一个亲历饥荒的普通农民，努力地剔除他的生动描述中的文学色彩，认真地恢复历史的本色，用平实、不带感情色彩的文字，记录

¹ 此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下饥荒年月文凤楼村民艰难度荒的基本情况，为三年大饥荒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信度比小说略高一点的标本。

1. 文凤楼村概况文凤楼建村几百年，

位于黄淮平原，不在黄泛区，地势西高东低，早年村子在现在位置的西边，与小李庄及杨桥相邻，邻近还有张庄、陈庄及高庄，村北五六里是镇子，村东有一条南北向的官路，村北及东均有小河，村南还有一条大河，文姓老坟在村南，义地在村西。村民大多姓文，当时钟字辈（基本上是中年人）就有 200 多人，此外还有胡、张等外姓，按此约略估算，此村人口应在千人以上。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荞麦、高粱、玉米、红薯、大豆、芝麻等，当地不产盐，有的村民在农闲时会擀炮、下粉条。

2. 饥荒年月，文凤楼村自然气候、农作物生长与收成情况

__1958-60 年，文凤楼村所处地区，“没有旱灾，没有涝灾，也没有蝗灾...称得上风调雨顺，那三年，那里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农作物生长良好，1959 年，文凤楼小麦丰收，公粮装满四辆太平车，大部分粮食都交到公社粮站去了。村东南 100 多亩春红薯长势喜人，但由于在雨天出红薯并削片，导致红薯片子发霉、发黑、坏掉。而这些霉黑的红薯片子成了文凤楼村民五九年冬及六零年春的主要口粮。村西还有五六十亩麦茬红薯，长得也很好，因公社要求枪种小麦，收获仓促草率，五分之四被丢弃、浪费了。此外，1959 年秋后，由于“反瞒产”，当年收获的大豆，除了留下的种子，几乎全部上交。

3. 饥荒年月，村民的主要食物及代食品

文凤楼在 1959 年底入冬以后，粮食开始出现紧张，村食堂改为每天两顿饭，半晌午供应的是用霉黑的红薯片子面蒸的馍，后半晌吃的就是大铁锅熬的菜汤，里面有干红薯叶、白萝卜条，再洒点红薯干子面。实行严格的定量供应，每顿大人每人两碗菜汤或两个馍，小孩减半。即便如此，到了 1960 年初春，文凤楼村还是陷入几乎断粮的绝境。此后，村民只能用霉红薯片子面掺苕草做成的草团子艰难度荒。饥荒年月文凤楼村民食用的主要代食品：各种农作物的衍生物，如谷糠、红薯秧子、玉米棒骨；各种野菜，如荠菜、细面条

（应是一种野菜）、羊蹄甲子、米儿蒿、狗儿秧，甚至刺角芽；各种水草，如荇草；各种树皮、树叶、树花，如榆树皮、柳树芽、槐树花；各种昆虫，如蚰蚰、蚰子和蚂蚱。

4. 关于饥荒诱因的一个说法

既然“不是天灾”，庄稼长得也不错，为什么“粮食不够吃，生活不太好，南边还饿死了不少人”？粮食都弄哪里去了呢？在一个收割豆子的日子里，文凤楼村召开全体社员大会，队长文钟山刚从公社开会回来，听李书记传达了上级精神，据文队长说，饥荒是苏修逼债造成的。如此看来，苏联逼债导致饥荒之说，在六十年代初，饥荒后不久，就由政府组织，自上而下一级级传达到基层了。因此，这种奇特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5. 文凤楼村的公共食堂

文凤楼村的食堂是1958年大炼钢铁前后开办的，历时两三年，作者说食堂解散的时间是麦收后不久，根据叙述的时间顺序判断，可能是在1960年夏秋，但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公共食堂大批量、最终的解散时间为1961年春夏。

食堂建在以前地主家的四合院里，南屋四间是厨房，共有两口大锅，两炉煤火，北屋四间和东西屋各三间都作了餐厅。食堂有专职伙食长、好几位女炊事员，还有专职管煤火的。食堂开办时，供应三顿饭，村民在餐厅里就餐，后改为两顿，开饭时吹哨，村民分列两条长队，两个炊事员从两口大锅里给村民打饭，村民把饭拿回自家去吃。

公共食堂给农民制造了虚假的安全感，“反正吃饭靠大食堂了，上面不会让大食堂断顿”，但村里真的面临断顿停伙时，队长除了铤而走险、撬开两队共用的仓库，偷取若干霉黑的红薯片子之外，似乎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向上面求助。显然，他知道上面是不会管的！不仅不管，还揣着糊涂装明白，在饥荒肆虐之时，让文凤楼村报喜，介绍办好食堂的经验。公共食堂成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和特殊化的温床。伙食长文钟海吃里扒外，滥用职权，他和他的家人不仅没有挨过饿，1960年，整个村子只有他老婆生出了一个孩子，而且，他还用食物引诱并与外姓妇女通奸。此外，上面的干部也常到村里的食堂吃吃喝喝，没有任何

定量限制。公共食堂还是乡村干部权力的源泉，他们手握饭勺，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以威胁扣饭、实施扣饭的手段，强力推行严苛的管理方法、严厉惩罚违规违纪或不听话不屈服的村民。

从作者的记叙中，无法推断大饥荒与公共食堂的关联程度，并且，在食堂解散时，没有人欢呼、感到高兴，有的只是茫然和无措。但是，解散食堂后，“好在各家重新拥有了自己的锅”，为村民自助度荒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6. 饥荒年月，文凤楼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作者说，文凤楼村“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饿死人”，如此说来，这不仅是个奇迹，更像是一个神话。当时，饥荒面积很大，村的南北方向饥荒都很严重，正大面积地饿死人，周边的四外村，每个村都有饿死人，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地经过、进入文凤楼村，陆续有人饿死在村里村外，甚至出现暴尸荒原的惨况。这一切好像与文凤楼无关，村里的食堂始终没有断炊，没有人偷偷跑出去逃荒。虽然村民饥肠辘辘，饿得头晕眼花，不少男人已得了浮肿病，但没有人直接饿死，饲养员因腹泻致死，队长不承认与“生活不好”有关。

文凤楼，仿佛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是风暴中的一处港湾。只是，穿过历史的迷雾，远远地回望过去，这片绿洲显得那样的虚无缥缈，这处港湾看上去更像是海市蜃楼。没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理由，可以让文凤楼村的命运与几百万个中国普通乡村有丝毫不同，没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条件，可以让文凤楼千余村民安然度荒、无一饿亡！毕竟，他们在极度饥饿中，苦熬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按照作者的叙述顺序，把饥荒年间发生在文凤楼村的非正常死亡情况整理如下：

1) 死者文某氏，是队长文钟山的母亲，死亡时约六七十岁，死因，腿生脓疮，后发烧，浑身发抖、发冷，陷入昏迷，衰竭而死，死亡时间，大约是1960年初春（洋槐树发芽时）。无法判断文氏死前是否得了浮肿病，也无法确定她的死亡是否与营养不良有关。因此，严格地说，不能把文氏的死亡归类为非正常死亡。

2) 死者文钟祥，队里的饲养员，死亡时约四十岁上下，死因，急性肠胃炎，呕吐腹

泻，发烧痉挛，体内严重缺水，急症致死，从发病到死亡仅隔一夜，死亡时间，麦子拔节、豌豆出头时（可能是1960年4月中下旬）。“他的死跟饥饿有些关系，但他不是直接饿死的，只能算是病死的。”

3) 油锤之死，油锤是村民文老鸡（退伍军人）的长子，死亡时约十来岁，死因为大量食用癞蛤蟆，中毒致死。死亡时间应该在饥荒后期，“民主补课”运动开始以后，当时，村里的食堂已经解散。毫无疑问，油锤之死与饥饿直接相关，饥不择食，饥荒期间，饥民因食用不该入口的东西以及食物中毒致死，屡见不鲜。但是，同样，我们不能说油锤是饿死的。

4) 虎堂之死，虎堂是民兵连长文怀远的长子，年龄不详，死因为过量食用生玉米，无法消化，导致肠梗阻、破裂。死亡时间是秋庄稼长起来时（可能是1961年秋）。对于虎堂之死，我们不仅不能说他是饿死的，还必须说他是撑死的。但是，谁又能够否认虎堂的死与饥饿直接相关呢？

毫无疑问，作者是把以上四位乡亲的死亡情况当成典型事件进行处理的，文凤楼村在饥荒年间的死亡人数，无论正常还是非正常，显然不止四位，纪录的死亡事件涵盖了男女老幼，均与极端贫困有关，除了文氏以外，均与营养不良、食物极度匮乏直接相关。这里，作者以委婉而温和的态度，十分隐忍、含蓄地揭示饥荒带来的苦痛，但在描写逃荒者、外乡人的饿亡事件时，则是浓墨重彩地挥洒、宣泄情绪，没有任何顾忌和保留，读者在含泪阅读的同时，甚至能够想象出作者含泪写作这些片断的场景，他用近镜头、特写的方式，直播麻表哥一家四口之死¹、妹夫之死，场面凄惨悲凉，让读者（应该是观众）直面饿殍，惊诧莫名，同时感到万分悲伤，潜然泪下，愤懑不平！让人们忍不住发问：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凄惨？为什么饥荒如此严重？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这正是文学的力量！

研究三年大饥荒约十年，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饥荒那么严重，逃荒要饭的人那么多，为何没有任何赈济措施？为何没有任何组织或机构救助、疏导逃荒的人，而听

¹ P96-102

凭他们走向饥荒更加严重的地区，走向绝路，走向死亡？即便是饥荒最严重时期，农村基层政权还是健全的，通过驻队干部，公社还能对生产队（村子）的生产生活进行有效的掌控，为何他们坐视农民忍饥挨饿，坐视逃荒的人自生自灭，而不采取任何措施缓解饥荒？这不是谴责，的确是困惑，这其中真正的原因，或者说，背后隐藏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贝克在《饿鬼》一书中提到，饥荒末期，在河南光山县，士兵坐着卡车，把成袋的面粉扔在路上，奄奄一息的农民，就在路上生吃。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极少的由政府组织的救灾努力之一，也是最粗放、最奇葩的救荒方式。面对饥荒，基层政权不作为，基层干部不救荒，难道真是因为政治压力巨大，举国上下生活在政治谎言之中，粮食变成皇帝的新衣，只要毛皇帝不戳破粮食多的吃不完的谎言，就没有人敢提救灾的事？对于三年大饥荒期间，救灾努力缺失的真正原因，仍需要更多的史料，进行更加专业、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以上六小节所述内容，应该可以算作刘庆邦家乡的饥荒史。无论是为历史作证，还是要守卫记忆，都需要良心与勇气，需要执着与认真。挖掘、记录混沌而悲惨的历史，更需要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原上的歌谣》对于三年大饥荒的研究，其历史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两次阅读，相隔七年，再次阅读，依然震撼。没有前言，没有序言，甚至也没有目录。开门见山，开篇就唱，通俗的民谣，平实的语言，仿佛能够从中嗅到草腥味，说的却是惨淡的生活，痛苦的往昔。能够感受到作家的无奈，也能体会到他的坚决和义无反顾，这是他乡亲的苦与痛，也是他自身的伤和悲，至今仍没有人能够毫无顾忌地述说，或敢于直抒胸臆地写出，他，刘庆邦，要用平原上最朴实的歌谣，唱出他及他的乡亲们心中最深切的痛。■

【怀人】

一个厚重的背影

——哭学泰老师

张鸣

跟王学泰老师认识这么些年，从来没想到他会走，在路上打开手机，微信里突然蹦出来一个消息，说学泰老师走了，当时就惊呆了，下车，塞给司机师傅一把钱，就离开了。回到家，泪如雨下。

怎么认识的学泰老师，我都忘记了。还没来北京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名字，就跟众多北京的名流学者一样，只能仰视。刚来北京的我，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小辈。以我的个性，也不大可能登门拜访谁。记得好像是我在《读书》上发了一篇跟刘志琴老师商榷的文章，学泰老师替刘志琴老师找我，就这样认识了。

学泰老师是一个老北京，一见面，就让人感到亲切，高高的个子，人长的厚重，为人也厚重。无论跟谁，从来不说重话，对我们这些小辈，能帮一定帮。记得那时候我满世界找《采菲录》，无论哪儿都寻不见，跟学泰老师一提，就给我借到了。当时清史所的黄兴涛他们，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几册，而我却是全的。

后来打着还书的借口，登老师的门，一见面，就赖着让他请我吃老北京的白水煮羊头肉，那是我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上看来的，馋的只流口水。谁叫老师是出了名的美食家（有厚厚的美食专著为证）呢？学泰老师费了好大劲儿，找了一家馆子，对我说，这家还凑合吧。那天，我吃个饱。在我大嚼的时候，我发现老师基本不动筷子，笑眯眯地看着我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头肉，再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个感觉了。

学泰老师读书多，是个活字典，凡是读书有了不明白的典故，打电话过去，一问，十有八九，都会有答案。即使当时没有，他会让我等着，过不了多一会儿，他就查到了。有一回，我在一篇随笔上，提到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日本留学时嫖妓，记得是他自己说的。

但文章出来之后，一个自称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儿子，非要跟我打官司，说我污蔑。当时，情急之下，一时竟然忘记了出自什么地方，一个电话打给学泰老师，马上就有大概的方向了。告知了对方出自向恺然的那本自述，对方也就算了。

学泰老师健谈，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老师在文革前，就被打成反动学生，坐了多年的大牢。跟我们讲牢里的故事，听得我如痴如醉的。好多老北京的事儿，也都是从学泰老师嘴里才知道的。从他那里我知道，老北京那时候买东西都不付现钱，每年三节结账，分文不差。商家和顾客，互相的信誉都好得不得了。流民社会，是他研究的专长之一，这个事儿，我们倒没怎么多聊，因为书在那儿摆着，看就是了。有时候会有些体会，跟老师说的不一样，才跟老师抬抬杠。无论我怎么顶嘴，学泰老师从来不以为忤，只是宽厚地笑笑。

见过为人忠厚的，但像学泰这样厚道的人，却也罕见。听过京剧名家姜妙香的轶事，说他遭了抢了，贼人把他身上的钱搜走之后，他追着人家说，我这儿还一块表，你们要不要？我总觉得学泰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别看平时他说起流民社会中的流氓，一份愤愤的样子，其实，真要是遇上了活不起下去抢劫的贼，他是给钱的。

跟学泰老师认识二十多年下来，从来没听说过他口出恶言，哪怕哪个混人整了他，也只不过一笑置之。不出恶言，不臧否人物，是老一辈学人的风范，但在那一辈学人中，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但是，学泰老师就是这样。

一直觉得学泰老师很健康，虽然坐过牢，但身体好像还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打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即使不停机，也再也听不到他带有磁性的声音了。

恍惚中，我好像看见了学泰老师，不过，只是一个背影，一个高大厚重的背影。■

【述往】

我的妈妈胡志涛在“八五”事件前后

丁东红



1966年那个动荡夏天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这一代亲历者永远不会忘记的。眼看快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的中学生现在都变成了可以向儿孙辈讲述往事的爷爷奶奶。但那段往事却随着世纪迁移而渐行渐远。然而，这段历史是不应当被遗忘的，尤其是这段历史的真相被时光的风尘掩埋时，我们有责任去抢救存留在我们记忆中的零散片段，让历史在细节中连贯起来，呈现出它的真实面目，让后人得以了解、反思并记取教训。

（晚年的胡志涛校长）

1966年，我的妈妈胡志涛是北京师大女附中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没有正校长），她与北京市所有的中学校领导们一样最早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首当其冲地受到猛烈的冲击，身体和精神都遭到极大的摧残。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她用信仰的力量支撑着自己，不顾铺天盖地的狂潮，不怕单枪匹马上阵，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维护着党的声誉，维护着人的尊严。

那年的8月5号之前，吊诡的权力斗争把无数的普通群众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包括十几岁的中学生。在女附中，以当权派为斗争对象的批斗会接连不断，并且这种批判由开始的文斗很快升级为武斗。妈妈每次被批斗回来，身上都是伤痕累累。

有一次一群气势汹汹的造反学生到我们家里来，说是要单独找妈妈问话。她们把妈妈关在她的小房间，门也反锁上了。那天我和爸爸、奶奶、弟弟都在家，只听见里面高一声低一声地训斥。妈妈清晰而坚定地回应着的问话。

突然，有个女造反学生咆哮起来，紧接着就是皮带抽人的啪啪声，弟弟晓红一下子火了，跳起来冲到房门口要去撞门。爸爸和奶奶死命地拽住他，我紧张地小声说：“别去，要不妈妈会更吃亏！”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听着屋里的动静，脸上挂满了泪水…终于，门开了，那群人叽里咕噜地骂着脏话走了。

妈妈平静地走出房间，她的目光清澈极了，额头上还渗着鲜红的血迹，见到惊恐的我们，嘴角划过一丝微笑，轻声说：“妈妈没事，去做你们自己的事吧。”

那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爸爸妈妈把哥哥宁宁、我和大弟晓红三个大孩子叫到家里说是开一个家庭会议。我家开家庭会议是有传统的，从我们很小的时候起，周末就会和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每个人讲讲自己在学校的表现和有趣的事情，相互提提意见，还鼓励孩子们对爸妈提出批评，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畅所欲言。严肃的会议之后，就是娱乐时间大家表演节目，这时小弟小妹就是当然的积极分子，大哥爱唱苏联歌曲，我就唱在少年合唱团学的新歌，爸妈也参与唱歌跳舞，一家人其乐融融。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的家庭会议就中断了。在中国社会和我们家庭都面临疾风暴雨的关键时刻，爸妈预感到了什么，因此这次的家庭会议非比寻常，气氛严肃、沉重。大哥、我和弟弟三个中学生，还无法对面前发生的一切做出准确的是非判断，内心承受着我们这个年龄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都是一脸茫然的神色。

会议开得不长，记得是爸爸先说的。他首先谈到妈妈最近受到的严重冲击，然后说，根据他和妈妈多年来的共同生活和了解，他认为妈妈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有一些错误也是工作上的问题，或者说执行了错误路线，但她绝不是反党分子。你们孩子们如果发现爸爸妈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毫不留情揭发批判，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由爸爸出面表态澄清他们自身。在这之前爸妈从没有压制过我们，而是由我们自己去判断是非，包括对于他们的看法，爸爸妈妈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们内心的

坦荡。我想起当初女附中的一些造反学生到二附中找到我。让我站在革命派一边，揭发妈妈的反党罪行时她们玩了个心理战术，让我给妈妈写“敦促投降书”，我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挖空心思寻找我妈妈的疑点，希望能揭发出点问题：最后还在信封上写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没想到事后妈妈还笑说，这孩子单纯，不拘私情，敢于大义灭亲。

在这次不寻常的家庭会议上，爸爸详细讲了他和妈妈抗战期间在敌后做地下工作的情况，特别是被捕入狱的前前后后，最后是党营救出狱，是无条件释放的。爸爸说，我们的历史是清白的，是经得起考察的。今天，我们也会经得住考验。我相信你们的妈妈，希望你们也相信她。爸爸的表现是那么从容、坚定，使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妈妈紧接着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我们也跟不上形势，很多地方还没想通，还没理出头绪，就被打倒了。不过从大的方面看我们总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现在形势很严峻，我随时都有被打死的可能。万一我出了什么意外，你们几个孩子哪个都不许叛党。大革命，小牺牲嘛，战场上也会有误伤的情况。再就是，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人打死的，我是绝不会自杀的。

听着爸妈语重心长的心理话，我一方面感到欣慰，我相信他们说的全都是真话，他们决不是“黑帮分子”，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保爹保妈派了，和他们的心贴得更近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十分难过，我感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压力，我不希望妈妈死，我想救人，但是似乎又无能为力。

这次家庭会议之后，我的脑子清醒了许多，虽然仍有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但不再盲从。我从妈妈的沉着和大无畏中得到了力量，我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要学着走自己的路。

那是极其压抑，极其黑暗的一段日子，但这只是一场更为激烈的恐怖丑行的前奏！8月4号，妈妈很晚才回到家。她和爸爸说，现在打人越来越厉害，基层干部的生命已经没有了保障。她撩起衣服让爸爸看，整个后背青一块紫一块，两个手臂都红肿着。她说，老卞也被打得很重，背上的肉都被戳烂了。爸爸的眼睛里有两团火在痛苦地灼烧，他沉思了

好久，起身到隔壁小宋阿姨家去了。小宋阿姨在教育部医务室上班，她的丈夫赵叔叔在铁路上工作，教育部和乐堂西这个开放式小偏院就住我们两家。

不一会儿，爸爸和小宋阿姨还有赵叔叔一起回来了，小宋阿姨一边给妈妈看伤，一边气愤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狠！真不敢想这是女孩子干的事！”她又急切地说：“不能就这么眼看让他们打死呀，出去躲躲吧。赵叔叔也说：“到我的老家去避一避吧，我们家是工人，地=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

爸爸再三斟酌，低声同妈妈商量：“要不就出去几天，到乡下去也行，等组织上把政策明确了就回来，”这时妈妈却出奇的冷静，她说：“我是校长，我不能走。工作组一撤，学校失控了，这么多老师都在学校呢，安全已经没了保证，我走了，谁管。”大家都不再说话，空气似乎也凝固了。最后，妈妈站起身来说：“别劝了，我不会走的死也要死在第一条线！”声音虽然不大，却字字铿锵。

夜色越来越沉重，爸妈屋里的小灯还亮着，不知道那一夜妈妈都和爸爸谈了些什么。我躺在床上，眼前总是闪现妈妈血迹斑斑的样子，就这样忐忑不安地睡了。

第二天一早，妈妈自己一人去找组织，这应当是前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商量好的，妈妈当时不仅是女附中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还兼任西区党委委员、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主要和经织接上关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学校的混乱情况，并求得具体指示。但是从市委到区委，各级领导都处于风雨飘摇中，给不出明确指示，只是让妈妈回到学校去。

中午妈妈疲倦地回到家。她很失望，党组织既没有出面保护基层党员干部，也没有以往的政策性指导，这简直比搞地下工作时的情况还要复杂。如何决断、如何行动，考验着人的觉性和良知。

8月5日的午后酷热难当，妈妈顶着大太阳坚定地走向她的学校，走向同事多年的老师们，走向她以往那么熟悉而今又陌生的学生们。在各级组织几近瘫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时，她明知凶多吉少，为什么情愿坦然面对呢？难道她还以为运用过去地下工作的经验可以机智地周旋吗？谁能想象，当理智遇到了疯狂，智慧遇到了迷乱、人性遇到了兽，

会是怎样可怕的后果！

“八五”事件已经成为文革中打死基层领导干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成为武斗风靡全国的始发点。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领导胡志涛、卞仲耘、刘致平、汪玉冰、梅树民被体罚殴打、折磨近3个小时，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其他人也受尽拷打与侮辱，不是骨折就是皮开肉绽，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那个血淋淋的下午发生在北京最优秀女中的事情。施暴者是一群年轻如初放花蕾的女生，遇难者是和这些学生朝夕相处的师长。历史已经将这一页钉在了耻辱柱上。如今行恶者们均已过花甲之年，不知她们是否悟到，人的肉身可以逃脱，眼睛可以紧闭，耳朵可以堵塞，嘴巴可以封住，而灵魂呢？那些不知悔悟的灵魂能逃过时间的追索、历史的审判吗？

当年的目击者们在几十年后向我追述刻印在她们脑海中那清晰的一幕：在所有的受害者中，胡校长是挨打最厉害的。但她在雨点般落下的棍棒拳头中始终昂着头，学生让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她坚决不喊。学生想用墨汁强行把她抹黑，她挥臂奋力抵挡，她的反抗越强烈，挨打越重。铜头皮带，带铁钉的木棒，劈头盖脸地挥舞，衣衫撕裂，鲜血飞溅，她艰难地一次次抬起头，不屈的眼神依然明亮。她大声疾呼：“同学们，你们要维护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在邪恶面前，她展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一些同学心里暗暗流泪，虽然不敢出面制止暴行，却又不忍离开命悬一线的老师，她们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她。

血色的残阳缓缓落下，夜幕掩盖了光天化日之下的喧闹罪行。黑暗中，往日温馨的校园被恐怖压抑得无声无息。

妈妈在哪里？她怎么还不回家？我们几个孩子坐在黑暗中，没有开灯，苦苦等着妈妈回来。终于有了轻轻的敲门声，老校工王永海闪身进来，一头栽在地上，哭泣着说：“快拿几件衣服吧：胡校长得换换衣服……”爸爸赶紧拿出几件干净衣服交给王永海，他一扭身又钻进黑暗中去了。过了大半个时辰，王永海搀扶着妈妈回来了。

妈妈头发已被剪得纷乱，清洗过的脸上的伤痕反而更明显，刚刚换上的干净衣服又浸

出了血迹。她的目光一一扫过我们几个孩子看到我们都在，好像放下心来，进到她和爸爸的小屋去了。奶奶烧热水，爸爸叫我进屋去帮忙给妈妈擦洗伤口。我永远忘不了妈妈那天的身体！妈妈是个具有良好锻炼习惯的人，她洁白健康的身体是我熟悉的。可是，揭下血衣的那一刻，我的血凝固了，呼吸停滞了，妈妈浑身上下除了脚底板没有一块好肉！

什么样的严刑拷打才能把人变成这个样子啊！我和爸爸小心地一点点擦拭伤口，妈妈偶尔轻轻哼声，一滴眼泪都没掉。我却忍不住泪水滴滴答答掉个不停，一盆盆血水端出去，我的心碎成了粉末！没有了委屈，没有了害怕，只有悲伤、愤怒！为这个混沌的天，为这个肮脏的地，为这个颠倒的人世。

这是怎样的一场动乱？！为什么要从老师身上开刀？不是说，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不是说，他们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吗？不是说，他们是将自己的生命无私奉献给祖国未来的良师益友吗？为什么要让这些从事最温暖、最理性、最智慧职业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是用这种极端残暴的方式？！这哪里是“文化革命”，这是革文化的命！

当晚，爸爸说，一定要想办法带妈妈去医院检查一下，她的腰恐怕出了大问题。可是我们住的教育部大院就在女附中旁边，机关大门时刻被人盯着，怎么才能出去呢？几个充满了正义感的机关司机班师傅提出开车闯一闯。爸爸拿出了搞地下工作的经验，他指挥一辆前面的车拉下窗帘，飞快地冲到大门口，果然立刻有人盯上了，他们拦住车拼命往里看。我和妈妈乘坐后面一辆车，没挂窗帘，妈妈在后座半躺着，我侧身挡住外面的视线。趁前车停下的当口，我们的车紧挨着就开出去了。

车开到北大医院急诊部，正想挂号来了几个人，看到妈妈的头发被剪成了阴阳头，就说不能给“黑帮分子”看病。我有点着急了说：就是俘虏也得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呀！可是那帮家伙很蛮横，非要轰我们走不可。正在这时，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走过来，她留心地看了我们一眼。忽然认出了眼前的病人，心疼地小声叫起来：“这不是胡校长吗？哎呀，怎么被打成这样？”我们还没缓过神来，她就大声对那几个人说：“起开起开，这是我们

校长。没搞清问题之前，一律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你们甭管了，这事由我负责。”不由分说，她就把我们接到她的诊室去了。

原来这位女医生是女附中校友，毕业后考上北医，当了医生。她可真仗义呀，领着咱们照X光片，做各项检查，开了药，最后还关切地叮嘱：“胡校长的腰椎骨折，一定要小心，不能再受到任何伤害了！”

“八五”事件之后，武斗并没有停止，反而推向了全国，很多造反的学生跑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大串联，还有的在抄家、“破四旧”打砸抢。妈妈的处境依然险恶，不时被揪到学校批斗一番，她的体力迅速下降，人瘦得厉害，几次昏倒在批斗现场。但是只要不开批斗会，她的精神还是那么旺盛，她联络了不少北京市的中学领导干部，经常以揭发批判的名义在一起开会交流情况，互相鼓舞支持，争取不要倒下去。

后来妈妈又被抓去关在牛棚，强迫所谓“劳改”。

几十年后，一位头发花白的男老师说起被关牛棚时的一段往事。有一段时间，胡校长跟我们关在一起。我那时刚参加工作，还很年轻，从来没经受过这样折磨，委屈、孤独，又看不到任何出路，几次想一死了之。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昏昏沉沉地靠在墙角，打不起一点精神。胡校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她一边大声招呼大家吃饭，一边走到我身边，叫着我的名字把饭碗递到我手上：“来，多吃点儿，下午还得干活呢！”她在“干活”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说话的时候还特意深深地盯了我一眼。那时我们整天被造反派看着，相互之间不敢交谈，我都记不起有多少天没讲过话了。胡校长看我的眼神那样温暖，和她对视的一刹那，一股热浪涌上心头，恍惚间什么文革、牛棚、批斗会似乎都不存在了，就像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讨论教案。一丝生的希望油然而起。

胡校长身上的压力多大啊，她还以这么一种乐观的心态鼓舞、感染着我们，我的生命火苗重又跳动起来。现在想想，那时要不是胡校长在身边，要不是她这么关切地盯着我，可能我真的就会自杀了。

直到1968年7月，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山下乡去北大荒，临走都没能见上妈妈一面。

1969年春天，妈妈被“解放”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东北来看望我们三个“知青”。她只字没提自己受到的苦难，仍然像过去一样，鼓励我们好好干，要勇于克服困难，要充满信心去努力。过了很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才意识到，妈妈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到边疆来，在黑龙江省转了一大圈，从北到南又到东，只为了看一眼儿女们，这是多么博大深沉的母爱啊！

妈妈小时候家境比较好，她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大，从小聪慧懂事，读书用功，因此得到外公的器重，一直供她读书。每当妈妈把她的成绩单拿给外公看时，外公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喜滋滋的。据说他曾感叹：“好笋出在坝外。”这话里既有对女儿的赞赏，也有对女人命运的无奈。

妈妈在武汉读的是教会学校，叫作懿训女中，她上高一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抗战爆发后，妈妈被党组织秘密送到延安，又直接派往敌后。抗战八年她主要在二战区(西北)做地下工作，曾经被捕入狱一年多，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抗战胜利后，作为当时稀缺的党内知识分子，她曾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然而当老师是爸爸妈妈从战争年代起就一直向往的职业。这一愿望后来终于实现，妈妈和爸爸一起成为人民教师。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行知学校、育才学校工作。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父母随中央机关进城，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接管了师大女附中。

妈妈从17岁参加革命，在除旧革新的社会大潮中，她始终未曾放弃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并把这种追求与妇女的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妈妈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其中就包含着通过教育提高女性觉悟和素质的初衷。在女附中工作的十几年，妈妈几乎把她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学生们身上。她关心学生们的思想成长和学业进步，鼓励她们自立自强、艰苦奋斗。

妈妈历来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她一直反对智育第一的做法，曾鲜明地在党内会议上对上级领导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提出批评。为此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而她却泰然地把这当成坚持真理的代价。我小时候学习成绩好，小学六年全都是五分。但是

印象中从来没有因为成绩好被妈妈表扬过，反而是要经常检讨自己的骄傲思想。当我欣喜地把金质奖章拿给妈妈看时，她却轻描淡写地说：“不一定要全五分嘛，四分也很好呀。”又说：“你看哥哥就会自己做矿石收音机，你也可以动手试试。”“你以后多帮助弟弟妹妹学习，妈妈就更高兴了。”

妈妈尤其反对女孩子的虚荣心，我们的穿衣打扮都是简简单单，我因为身材小，时常要捡哥哥弟弟的旧衣服穿。记得为了要不要留小辫子的事，还和妈妈争论过一阵，很长一段时间妈妈都要求我梳短发：“你看短头发多精神，每天还能节约好多时间呢。”

在我们的家庭会议上，对于学习进步是有表扬的，对得了几分父母并不很在意。而家务劳动做得好，帮助同学帮助邻里，就会得到大大的称赞。

妈妈对于女同学的健康非常关心，她当教导主任和副校长以后，仍然会每周到住校生的宿舍楼去巡视。五六十年代的女同学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有一些人不够开放，尤其在集体生活中总有些事感到羞涩。妈妈就不厌其烦地告诫学生们：内衣内裤和卫生带一定要拿到阳光下晒晒，千万不要偷偷藏在床底下、桌子底下；生理现象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至今有些老同学提起来仍感到亲切，感叹地说，没想到那么严肃的胡校长还管这事，她是多么深爱着我们啊！

上世纪60年代，女附中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叫周学敏，教我们实验班的语文课。周老师刚来的时候，有人说她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水平，言外之意是她不配在女附中当老师。但是妈妈对周老师没有丝毫歧视，反而因为周老师是从家庭中走出来的，对她格外关心。

后来周老师的作文课进行教改实验，我们的作文习作多了，很多人都开始写日记和小作文。周老师的作文讲评课非常生动，全班同学的写作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上作文课的兴趣十分高涨。我记得那时特别爱看周老师写的作文评语，她总是以欣赏的口气品鉴你的优点，及时表扬点点滴滴的进步，对于不足之处的点评也很风趣。班里的墙上常常是作文挂得琳琅满目，大家兴趣盎然地互相观摩、热烈讨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老师的语文课教改受到了严厉批判，甚至被说成是阴谋。

周老师的丈夫是23中的校长，也同时受到批斗，这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周老师身体不好，每天拎着一个药罐子来学校，头也不敢抬。妈妈为此事特别担心，多次跟我说：周老师有什么错？这样折磨她！真想跟她说几句话，但又怕连累了她，只能通过关注的眼神给她一点力量，希望她一定要挺住啊！但是不幸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周老师由于不堪忍受而在自己的家里含冤自尽。妈妈得知消息那天难过极了，她十分痛苦地同我说，周老师是受不了别人对她丈夫的摧残迫害，感到绝望；如果只是她自己受批判，我想她还不至于走上绝路啊！

那时妈妈每天挨打，浑身是伤，她却置之度外；但是对于周老师的死，妈妈是如此悲痛，她的心在流血，我被深深震撼而感同身受。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她沉稳、乐观、坚定、自信，是因为她的精神世界充实。她有一颗自由、宽广的心，她尤其崇尚那些独立自强的、有个性的、有事业心的女性。

妈妈时常同我讨论她所敬佩的人，像林巧稚、武则天、绿川英子，张海迪等等，她对这些古今中外的杰出女性怀抱一种特殊的敬意。林巧稚医生是妈妈经常挂在嘴边的，妈妈佩服她这种事业型的女人，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医疗工作，她放弃了婚姻、家庭和做母亲的机会。但是她亲手接生了五万多个婴儿，她是千千万万孩子的伟大母亲！妈妈说她既是专业领域中的精英，也是做人的楷模。

我还清楚地记得，妈妈退休后收集了很多有关武则天的资料，她说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个人的历史功过，要写文章、写书，还让我跟她合作。妈妈认为，以前对武则天的评价不公平，说她残暴、玩弄权术。哪个封建皇帝不是这样？为什么男皇帝就不说了？其实武则天知人善任、敢做敢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尤其在男权制的封建社会，能做到她这样真是了不起！

绿川英子是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世界语学者、作家，她积极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并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妈妈在抗战期间曾经见过绿川英子，出于对这位女性国际主义者的钦佩，她在敌后和解放区工作时，曾投入极大的热情学习世界语，成为世界

语之友。直到我们长大以后，还时常听到她讲几句世界语。

20世纪80年代以后，著名残疾人作家张海迪的事迹感动了花甲之年的妈妈，她赞叹地说，这个女孩子真不简单！自学大中小学课程对于健康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她还学习针灸为人治病，学了好几门外语，出版了翻译作品，她的思想超越了许多人啊！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的眼睛已经不怎么好了，青光眼和白内障困扰着她，看书写字都很费劲。她买了本张海迪的《轮椅上的梦》(1990)，让我上初中的女儿读给她听。女儿回忆说：“那时我一做完作业，姥姥就叫我带上这本厚厚的书，和她一起到湖边或者小树林去。祖孙俩读一段、讨论一段，共同的感动让我们忘记了年龄的差距和辈分。书没读完，姥姥就要去安徽了，她跟我约定，等她回来后让我继续给她读这本书。没想到姥姥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这本书是我自己一个人读完的。”说到这儿，女儿的眼圈红了，“姥姥对我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是真正的言传身教。”



在我看来，妈妈身上，有着林巧稚的博爱、武则天的胆识、绿川英子的忠诚、张海迪的坚强。同时，她也是这样要求、培养自己的孩子和学生的。有人让我归纳一下，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传奇的事情，却又那么简单；她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怀念，却又那么平凡。我想了好久，为我敬爱的妈妈写下三句话：

一身正气，忠于信仰的老共产党员；

呕心沥血，乐育英才的教育工作者；

人品高洁，平凡伟大的新知识女性。■

2014年7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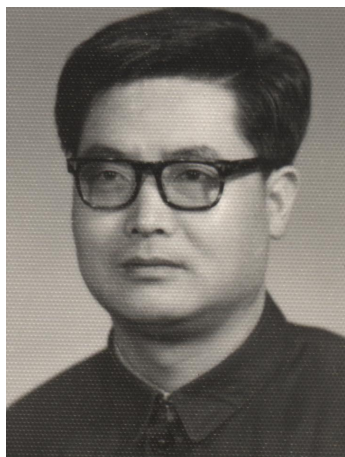
于北京

【述往】

当年逾墙偷桃，后来培植桃李

——一位中学班主任的文革琐忆

安希孟



（本文作者像）

记忆具有意向性，选择性。记忆的选择性还有选择胜利光辉的一面。比如记吃不记打。一位学者云，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用当下目光视角观察记忆的产物。不仅如此，历史仅只是当代当下的记忆而已。我当过一个高中班主任，后来缺少联系，所有的过往都统统遗忘。那保持联系多的一个班，过往趣事都记得清晰，当代当下有联系，便有往事记忆。

我是谁？这乃一个了犹未了的老问题顶帽子，“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像幽灵一样盘桓，在一东亚上空飘来飘去，这足以使人胆寒心悸我们同这幽灵纠结了几十年，这幽灵野魂一会儿钻到大脑中枢，一会儿又钻到自发的自动的农民小商贩罪犯小偷卖淫女发廊妹身上，连小学娃娃也孜孜不倦声情并茂斗私批修深挖猛，批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灵魂儿深层爆发革命。

这满山遍野的敌人打不完呐。哈哈，你还有个人主义？别闹笑话了。你知道神马是个人主义？你有自己个儿主体意识？你什么时候启过蒙，复过兴、希过腊？你什么时候读过彼特拉克薄伽丘斯宾诺莎达芬奇？

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算老几。我曾冒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自己批判己个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己抽自己嘴巴子斗私批修——你你你算老几？你还害“修”？谁批准你当资产阶级了？后来资产阶级开会，说我是假冒伪劣商品，是混进资产阶级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我被清除了。我又听说，自己成为了劳动人民一部分。

我是谁？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实证哲学经验主义归纳戏法，还是分析哲学先验论唯心主义演绎魔术？我无家可归，居无定所。我打哪哈儿受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阴暗思想影响和浸染？我和资产阶级任何人拉过手接过吻说过话恋过爱同过床吗？我自幼是一个纯洁温清的少女，童贞无染，美丽可爱，从小天天批判没见过面的资产阶级，恨帝修反恨得牙关节锉，恨没见过面的资本主义。肚子吃不饱，就成天担心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帝国主义反动派，我是恨透了。国史党史，初高中大学政治课，老师们个个都很进步，很革命。哥哥也从小就爱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回忆光绪三年大灾荒——光绪年间连我爸爸连我爷爷也没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白天黑夜，都是接受革命思想熏陶。互相打斗，就说对方是地主资产阶级。

我曾经狠狠抽自己嘴巴子，咒骂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动立场。但是我自己个儿始终不明白，自己从哪哈儿空穴来风，凭空长出许多资产阶级坏思想？猪能长出羊尾巴？我思虑再三，自己个儿也没有厂房，不雇工剥削，算不得资产阶级。我打哪儿见到过、听到过阶级敌人的宣传？我连恶魔 VOA 也没听过。

圣哲睿智之人，都不是生来如此。大家都有衔手指的故事。我当学生时也有恶作剧，比如在门脑上放置笤帚，人家一开门，笤帚就砸脑袋。在阳台上往过往朋友身上泼水——吴振民同学还记得吗？我们不都是正人君子。在北师大，1969年秋，我和同学晚上到生物园偷苹果梨。从校外杨树上踩踏铁丝网围墙爬进生物园，恶作剧。

1972年春天，我在北师大偷完桃子，就卷起铺盖，滚到银川，当了银川六中班主任。学生入团得经过我，可我连团也没入过。班上同学还有团支部书记李秀华，得服我管。我们这个社会，人不算什么，再普通再下贱的小人物，贱若粪土，小草也，但也会以社会主子自居，气势汹汹。我当时严厉管教学生：可我明明一贯就是自由散漫之人。我向校党支部书记坦白：我连团都没入，怎么还能批准学生入团？银川六中书记周锋先说：“你是受党委派做班主任”。我这个思想一贯落后的人，忽然就以代表自居，正人君子似地担当起思政工作。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忠顺仆婢般尽职，成了当权者的政治工作尖兵前卫。谁要

是有点离经叛道，我就对之严加管束。银川六中规定每天下午半个小时学生政治学习读党报宁夏日报，我严加监督，让每一个人竖起耳朵聆听。我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就神气活现。当年被我批评的学生，如今挂在嘴上的话是：我和别人身份不一样，是秘书记录，不能有自己的个儿看法。呜呼，这就是人的异化。异化了的人还叫人？中文骂人“不是人”，此之谓也。被驯化的老虎，还是老虎吗？有一件事趣味得很，有一个调皮学生，大家拿他没办法——老师生来就是拿学生当敌人。他有一次写英语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龙丽芙切尔曼茂），写成“Long live Chairman Ma”，“马主席万岁”。教导主任（那时叫教革组长）就说，抓住他这一点，就说他写“反标”，意思是“马鸿逵（昔时军阀）主席万岁”。好在我没有抓这个辫子。师生如猫鼠。

我当学生时，很调皮顽劣。奇怪的是，这样爱捣蛋的人一旦掌一点儿小权，就对娃娃们非常苛刻严厉。上课，孩子们必须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可孩子们的天性就是玩儿。然而我自己，学校开大会，我必做逃兵，或迟到早退，或交头接耳，私语窃窃。开会时大家慢悠悠，不守时，是“个个跃进”。但我对学生完全是按照当时的政治水平，按照报纸杂志社论文件灌输教育的。我自己个儿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有新见识，那也是努力发挥延伸，宁左毋右，比上头更激烈些，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每个历史阶段，我也都是按照社论文件思考言说。没能教导学生独立思考。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只能培养循规蹈矩的人。我自己不可能有异样的见识。知识结构、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大环境就那样。改革开放才使我对自己的过往有了大义觉迷。我甚至想，假若还是“四人帮”时期，我们会同样拥戴追随紧跟高举。这没问题。

1973年12月发表了黄帅日记，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那个冬天寒假，区教育局一行人马来十一中调查反响。大家伙儿对黄帅小姐备极仰慕之忱。我反了一次潮流，鼓吹今不如昔论。回去后，自治区教育厅就十一中发言向全区做了通报。“四人帮”结束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难免后怕，腿肚子筛糠。“四人帮”结束后，市教育局开座谈会，徐怀礼副局长询问此事。

我和盘托出。后来徐怀礼局长还责问自治区教育厅。我的同学王邦秀，时在自治区教育厅，说那个通报其实也没被当回事儿，只是客观报道。可在那个体制下，在人治时期，有嘛客观可言？通报了，就泰山压顶。如果有人说是个大问题，你就吃不了兜着走。政治运动就这么回事儿。有人乘风扬灰，你就倒霉。领导开明一点儿，大家相安无事。非法制、人治、长官意志、没规程、没规则，你得碰运气。人治，就是如此。比如李庆林、黄帅、张铁生，不是依照规矩成一时豪杰，而是撞大运，但有时就倒大霉。

在银川十一中我担任班主任，率领红小兵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产阶级法权，评法批儒，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宁要草不要苗，学习马列六本书，都很积极。受重用，顺杆爬，识抬举，金镶玉。学校教工学马列核心小组，我和语文老师杨肇荣是教师代表。“以我为核心”这个词，就打这儿来的。每周一次，晚上学习，顶风冒雪，不分寒暑，夜间骑车到学校，读《国家与革命》，还上瘾。其实看不懂。左派幼稚病倒有一些。银川市教育系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产阶级法权，学儒法斗争史，还请一中二中政治教员辅导。当年我是用马列思想两报一刊黄帅、铁生斗争哲学熏陶学生的。他们少年时代受到简单化实用化的庸俗哲学的教育。师生关系成“斗地主”关系。1975年我还被评为银川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参加先代会，屁颠屁颠，一纸奖状保存多年。那时候填表有一项“受过何种奖励”，我每次都填上。

那时也给学生讲陈胜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似乎并不讲人人平等，不知道王侯将相与寒门庶人平等。这些受我教育的学生，今已快六十岁，革命锐气，豪情万丈，无产阶级革命爱国战斗精神，抵制日货，倡议不吃啃德鸡，不用美日科技，其昂扬反美斗志，不减当年。东风吹战鼓擂，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那幼小心灵里永远埋下反帝(但现已不反苏修)种子，今已开出艳丽的花。这都是我苦心孤诣培养的结果——可不是恶果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不必贤于弟子，他们大大超过了我。

我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热血青年。我的学生前不久倡议抵制美货日货韩货干货水货浪货贱货傻货，还鼓励没吃过麦当劳的我远离麦当劳“庖厨”。“老师应该欣慰您的学生们有

爱国的心和热情，如果面对国家的兴亡学生们一个个麻木不仁那可可怕，尽管大家年过半百还都是血性男儿，还是应该感到自豪的。尽管有前几次的抵制日货，可是中国人在实际行动上旅日购买日货的热情并未降低和减少，日产的汽车、日产的电气，甚至连马桶盖从日本背回把人家的库房买空，买空还遭到日本人的白眼、骂中国人：没素质。”马桶盖与爱国，多好的主题。

1976年，我在银川十一中，经常带一帮娃儿们下乡插秧劳动，唱红歌，学梁效文章。广阔天地，还真就练就出一堆闪闪红心(红星)。因为大家看的电影就是决裂。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斗争哲学战斗的革命政客头脑里，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我的学子，十几岁时，初中没毕业，未成年人就中途辍学，上山下乡。还不到十八岁，就被赶到乡下。没想到这一再教育，他也会替政府提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按规定，他们家，他和哥哥应该有一个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其兄才能免于去农村的倒霉厄运。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是现代化、商业化、知识化、工业化、都市化。然而反其道，学习后来的波尔布特，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实行穷民、愚民政策。穷不可怕，愚最可怖。

在银川十一中，学生要从小当批判家，批判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弟子规、女儿经——现如今读经要从娃娃抓起，颠倒了个个儿，少年读经班，办私塾，拜孔子，穿唐服。后来是学计算机从娃娃抓起。那时是娃娃从小批判三字经，从小反修防修，从从小当批判家，从小反潮流，或从小上街到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奇葩的还有粮店预备针钱包)。红小兵关心国家大事，这战斗情怀影响人生一辈子。一个大国，全民合伙批一本书，全民炼钢铁，全民写诗歌新民歌运动，从小读红楼梦——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一部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和封建制度兴衰史。沈桂芳是团总支书记，曾让我给学生干部讲解批判《神童诗》。我呢，就借机学了点古典文化。没成想，神童诗现而今成灿烂瑰宝。

1974-75年，我自己得天独厚，订阅的《北京师范大学报》上有神童诗批判材料，注释极详备。这就是资料优势，人无我有，做学问的要件。其实我从小没受过封资修教育，这次借机从头到尾读了几遍神童诗、千字文！如果今天有少年大学生读国学，我又可摇身一

变去应聘，向世界宏扬国粹，立于不败之林。我那时还订阅《北大学报》，上海《学习与批判》。1978年到二中后，学校给老师发书报费(这字眼儿消失了)，我订阅《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还有《光明日报》，算是博览群刊，所以大批判就能着先鞭，当专家！后来我又从二中图书资料室化公为私了几册中外哲学史读物，算是给自己充电。

1976年银川十一中在自治区教革委防腐蚀试点领导小组组织的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运动，我们组织学生批判黄色书籍。同学们由于政治熏陶，小小年纪就能明辨是非，大家的政治嗅觉特敏感，对坏书坏电影明察秋毫。例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就不容分辨地坏。大家心领神会，视为当然坏书。我们习惯于把一句话、一个观念、一本书、一首诗、一张图、一支歌，当作魔鬼。收缴曹才旺同学的“坏书”，有《红日》、《西游记》。革命者自己对准自己人。简直是一家不认一家人。那个荒唐岁月，老师当了人家打手，好歹不分，颠倒是非，伤害孩子们幼小心灵。我们，普通人，也当人家打手了。但按照当时时兴的两个基本估计（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们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格分裂。

战斗岁月，朋友不叫知己，叫“一个战壕的战友”，大家伙儿有战斗观念，火药味很浓的，怒目相对。受战斗熏陶长大，终身效忠不渝。动植物要自幼苗幼雏培植。小老虎精神，反潮流，革命小将。“现在开始播音”，叫“现在开始战斗”。不过那时上课已经不时兴祝祷了。硝烟弥漫，是那时人和人的关系。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小老虎”，去吃几只“小绵羊”。人的一生，青春几何？纯洁无瑕，容易塑形。这会影他们一生的人生态度。

我在宁夏日报发表了银川十一中的反腐蚀教育的通讯，头版，压底，就生动地显示了当时豪迈的战斗风格。

十一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也特别积极。我有一帧摆拍的照片当时3（2）班摆拍批“坏书”。注意，教室墙皮脱落，光线昏暗，桌椅破旧，孩子们衣衫褴褛。黑板没有边框。资产阶级，这个离孩儿们还很遥远很陌生的东西，正在遭遇“鞭笞”。

我们班批封资修坏书，读书无用，无书可读，还怒火万丈。附带说一下，摆拍，应该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造假行为。黑板上“批判坏书”几个字是我写的。照片里的学生怒指坏书的是吴明佳，旁边有吴瑞芳。孩子们被愚弄。毒害青年的“四人帮”反诬他人毒害少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回潮，批判按劳分配，提倡张铁生反潮流，抵制资本主义侵蚀，我们很亢奋，很上心，很在意，很发奋。对于“和平演变”的仇恨，洋洋乎充沛于字里行间。我让高桂英在校广播站广播，导引词是：“下面播送《宁夏日报》X年X月X日关于银川十一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教育的报道，题目是……”。结束语是“刚才播送的是……”。这报纸我至今保存。这是我的辉煌战斗经历。

那时候，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大南门参加群众集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同年庆祝粉碎“四人帮”，都是同一批人。但并非“群众”自发。大南门是银川的天安门，政治斗争的晴雨表。1976 四五事件抓反革命，在体育馆带领学生参加公审大会，生产队奸污女知青，就作为反革命枪毙。有些可能连猥亵女知青也够不上。

我觉得孩子们，或者臣民，如果有缺点那倒应该觉得是蛮可爱的。不顺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王尔德)。电脑手机比蜡纸打字机错误多，钢笔写字比毛笔写字错误多，活字排版比帛书锦书甲骨文错误多。越简单越原始，错误越少。现代人比古代人错误多，反动言论多，鬼点子意见分歧多，争论多！社会进步标志是犯错率高，错误多。封闭僵化时代，错误少，犯罪率低。越容易得到改正，越有纠错机制，犯错误的几率就越高。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犯错的几率高。桃花源里没罪恶，你回去？伊甸园好，但切莫回去。言论自由开启罪恶。言论自由是指错误言论的自由，是犯错误说错话的言论自由。天赋予人以犯错误的权利，人就有犯错权、发明权。错误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尺。文明进步给人类以更多的犯错机会和纠错机制，社会就进步了。

那是一个成天宣讲基本路线，以斗争为纲，年年月月天天讲的时代，念紧箍咒一般，不怕耳朵起茧，也不烦。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似乎无处不在。贪污腐化，是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野心勃勃，是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流

氓地痞阿飞小偷小摸超短裙喇叭裤，是资产阶级。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是资产阶级。小商小贩，投机倒把，农民种菜，养鱼，养猪是自发资本主义。每日每时，自发地大量地批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自由市场经济、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学校上课满堂灌，考试以学生为敌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书读得越多越愚蠢。废除高招考试制度，那是旧教育制度，地富子女旧学校教育出来的，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名成家，三名三高，养尊处优，虽有两只手却在城里吃闲饭，是资本主义。争名争利，吃香喝辣，奇装异服，讲吃讲穿，养花种草，养鱼养狗，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温情脉脉、人性论、天才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先验论。教育文化上层建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刘少奇林彪王关戚，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大学，资产阶级一统治天下。卫生部是资产阶级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是死人洋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踢开党委闹革命，十七年教育路线是黑线，知识越多越反动，动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何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净土？资产阶级是一大片，无产阶级是一小撮。敌人无处不在，草木皆兵。谁怀疑 a I l，打倒 a I l？谁是一小撮？谁才一大片？谁占百分之九十七？谁是百分一二三？这思想影响你的一生，直至终老。

1976年春夏，范晓慧老师从北京带回一些“谣言”。这是老百姓那时唯一表达免于恐惧权利和自由的时段。接着是“追查”。远在塞外的我们，也分享了中枢神经系统信息，有了政治参与。不知何故，政治对手总被冠以“反革命”。可谣言者，民谣也。如果广开言路，也许民众就用不着传“谣”言。接着是十月的盛天节日。只半年时间，春秋两季，银川南门广场参与集会两次，台上台下相同的队伍人群，两次喊叫不同语言口号。我作为老师，也不向孩子们解释为何会有两次性质迥异的大会，台上为何还是同一些人。于是看电影从《春苗》到解封的《洪湖赤卫队》《大浪淘沙》，到《杨开慧》，听拉兹之歌。我们总在翻来覆去和健忘之中。据说一出戏足以人头落地，因此《三上桃峰》就有倾覆之忧。

“四人帮”被擒获，《园丁之歌》上演，“没文化怎把革命的重担挑”，这句话得到

肯定。我讲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舞、虎、雨，wu, hu, yu, 按诗词格律，是押韵的。但我自作聪明解释说，湖南话，雨，念 ru, 就押韵了。

“战火中的青春”、“在战斗中成长”、“烈火中永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激情燃烧的岁月”形容十一中的生活，实不为过。下乡插秧，还得唱红歌跳红舞，为贫下中农表演节目宣传思想。文艺节目，李晓玲等人从宁夏歌舞团借来少数民族服装“巴扎嗨”。孩子们很有集体荣誉感。什么是学校？不光是上课做作业，也有课外活动培养群体观念，合作意识。有同学暴露活思想，说同学们追求“一分为二的鞋子，直达莫斯科的裤子”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语言很生动。大家伙儿争着编造“活思想”。注意，“活思想”是个贬义词。可是，难道思想不应该活起来么？狠斗“私”字一闪念。闪都不能闪一下。我于是把这当作同学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活思想”写到通讯里：多么生动风趣！那年头追求这效果，想方设法构织花样翻新的宣教语言糟蹋自己。那年月就这股傻劲儿。你的隐私，是不受维护的。先进与落后，发达与贫穷，智慧与愚陋，文明和野蛮，教养与粗暴，美丽与丑陋，常被弄颠倒。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绝伦。我们那时把事情弄颠倒了。

政治的时髦口号一个换一个，一阵接一阵，跟屁虫一帮带一帮，一茬替一茬，一群跟一群。错了不脸红。一切错误归于敌人。群氓跟着喊，反正错误不在自己。没有人为政治错误埋单。只有四五个替罪羊。注意，那只是替罪而已。更有人把荒唐罪恶当功勋、当勋章、当业绩吹嘘。一个不知道自省的民族没出息。一个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隐恶扬善，文过饰非，谎话连篇的民族没出息。明明错了，还脸不变色心不跳，大言不惭。一部不断犯错误的历史，居然被涂抹成一个功劳接续一个功劳。■

2017, 12, 2

【资料】

北京西城区大联合集训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用会发言

(1967年10月16日)

李南央（北京女十中）

按：1967年10月，我作为北京第十女子中学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同兵团总部的另两个头头曾令萍和李哲英，参加了西城区军训解放军为了在中学实现各派大联合所办的集训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隐约记得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至于这个学习班的成员是只有各校“4.3派”的头头，还是也有“4.4派”的头头，学习班每天都学习些什么，怎么学习的，已全无印象。只记得每天学习休息时，各校男女生混在一起打乒乓球，李哲英把外校的男生打得稀里哗啦。据曾令萍回忆，这次集训有“4.4派”的头头参加，地点在安德路中学。集训结束时，军训解放军召集了除集训队员外还有各校的一些同学一起开了个讲用会，我被军代表作为“4.3派”头头中通过学习取得进步的代表人物指定发言。那个发言稿我一直保存着，最后带到美国。除了这个发言稿，我还保留了被三机部专案组要求写的揭发我妈妈问题的草稿，兵团的一些“文件”和离校后跟同学们之间的通信。当时完全没有什么民间史料的概念，只是觉得这些都是自己青春的记忆，留着等老了、动不了了的时候再看看。承蒙“记忆”主编告知讲用会发言稿“有用”，很乐意将它录在下面，以为文革浩瀚档案中的一点“记忆”。它折射出的是些什么，则留给文革研究者去思考、书写吧。

这次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学习，第一次有充分的时间对自己的思想以及所犯的错误，作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对一些错误有机会冷静地进行分析、批判。下面我就谈谈我学习的一些体会、认识，有不深刻的地方，有失去了革命原则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批判。

“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极端错误的，帝、修、反从它们的反动立场看，认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国全面的内战，希望我们的国民经济出现混乱。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敢乘机而入，进行侵略战争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祖国。最近，中印边境打起来了，我们仍然不受任何干扰，继续安全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因为有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着我们的边疆，保卫着我们的国防。军队不能乱，否则，文化大革命将前功尽弃。那时不仅是敌人长驱直入，亡党、亡国之类的问题，全世界都要走回头路。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只剩下中国，而中国只要有这支军队，那世界仍大有希望。从下面的例子来看，黑龙江、贵州、山西都是造反派在最受压制的时候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解放军立即出动，坚决支持了左派，形势立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保守组织迅速瓦解，造反派迅速发展壮大，反革命哪里敢碰造反派一根毫毛。这足以说明军队的重要。从反面的例子来看，武汉反革命政变，由于军队被坏人利用，结果就是白色恐怖，造反派血流成河，连毛主席、党中央派去解决问题的谢付总理都没有立足之地。还是在解放军战士的保护下，突破重重阻力返回北京。但是，当军队一支左，形势又立刻大好。这更说明毛主席“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抓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过去我一直不愿承认，但是现在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不能不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了。虽然，我们只是稍稍误入了歧途，中央文革就及时亲切、严厉地指出了我们的错误。但是正如《解放军报》9.7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稍微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伟大战略部署，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在《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之后，全国到处掀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热潮，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当时的行动是阶级敌人全盘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认为林杰反党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把黑手直接伸入中学的，它是通过红旗杂志中学组实现的。当时，红旗杂志有个齐卫东同志经常和我们联系，他虽然很少说话，但是很明显，是支持我们的。他每次来都是听取我们对军训的意见，记录我们反映的解放军的情况。在这里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错误，丝毫不代表

总部及兵团战士。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兵团战士比我好得多。武汉事件出来后，在天安门开了大会，声势非常浩大，林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大会。一开始，我就认为一定有人要大作文章，那时，我们总部的陈玲、曾令萍也对我说：“你看着吧，现在要搞军内问题了。”我当时不同意她们的说法，以为这是资产阶级政客式的猜测。我只认为，中央这样重视这件事，造这么大声势，是为了让大家认清大批判的重要意义，不搞革命的大批判，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从而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可是随后，清华《井冈山》组织中学各校“4.3派”组织负责人开了形势座谈会，谈“抓军内一小撮”问题，会上许多学校的负责人都作了发言，有些学校说自己军训的解放军是8201部队的，有的是河南支持公安公社的，有的是张家口支保部队4618的。总之，对自己学校的解放军都提出了怀疑。后来清华的同学又说：最近我们跟红旗杂志中学组的同志进行了频繁的接触，红旗杂志认为中学运动的关键是两个①红代会问题。②解放军支左问题。说红旗杂志希望大家考虑“抓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后来他又说，根据中央首长的几次讲话，根据报纸，对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都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好就好在它总的命令、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上面好，下面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下不去，希望大家考虑。他又提出了一个线索，说据他们了解，东城联指周指挥是4618的二号人物，职位相当于李忠奇。会后，回到学校，红旗杂志的齐卫东同志又来找我，主要搜集对十二期社论的反应，特别搜集了解放军对十二期社论的反应，他也一再暗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上面改了，底下改不了。他不爱说话，临走说了三个问题①你们反映的情况，中央都知道。②上面改了，下面一时改不了。③你们解放军这样做肯定不对，这样下去，他们倒霉。回家以后，我又反反复复地学习了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它里面有这样一句十分明显的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斗倒、都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我分析，这十分明显，中央的精神肯定是要搞军内问题了。十二期另一篇社论中也讲到“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

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篇社论是针对武汉问题谈的，这里说的地位高、资格老，自然是指陈再道了。那后台是谁呢？自然是在军内。最后是：“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风暴吧！”什么新的风暴呢？去年八月是揪党内的风暴，今年八月就是揪军内的风暴。结果，我推翻了我原来的正确想法，认为抓军内一小撮是正确的，这是毛主席的又一伟大战略部署。去年八月搞党内，今年八月搞军内。我又分析，卫戍区是好的，排长、连长又根本算不上当权派，团长、政委似乎也够不上一小撮，既然上好、下好，问题就在中间了。联指、分指也许有问题。因为很可能联指官很大，不听李忠奇命令，或者欺上瞒下。我又觉得，别的师，别管解放军真心假心，“4.3”、“4.4”都支持，叫两派联合。唯独我们一师，都是支持“4.4派”压“4.3派”，干干净净一边倒。因此，我认为先从师部调查起。出于这个目的，我同意组织了调查小组，到唐山、石家庄去调查，又阻止了一个“揪军内一小撮”专案组，尤其不应该的是，我们为了抓军内一小撮，和“冲派”挂了勾，从他们那里领取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并参加了“冲派”和支持“冲派”的工人造反组织搞的“揪徐联络站”。在过去，我认为“4.3”是翻不了身了的，最好、最好就是争得个平等地位，不可能让我们吃掉“4.4。”。这一下，我认为“4.3”翻身之日就要到了：“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因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4.4”肯定要保，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新型的保守派，可是中央是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样中央一表态支持“4.3”，“4.3”就翻身了，“4.4”就算完蛋了。再说，如果从联指揪出了一小撮，那么我校支左肯定就有问题，搞得所谓联合就更成问题，那么也就更有力证明我们反对了，我们是正确的。如果说抓军内一小撮，刚开始我是出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好意的话，在有了想借此吃掉“4.4”的想法之后，抓军内一小撮就带上了强烈的派性。如果从党性出发、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应该是从心眼里希望我们的军队的领导权掌

握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干部手中，应该希望我们的军队在支左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应该希望军队中少出陈再道。实际上陈再道也是极少、极少，只占全军的百分之一、二、三。可是，当时由于派性，口里喊着一小撮、一小撮，可是到处都抓一小撮，实际上就成了一大撮了，实质在行打击一大片之实。在抓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我看到别的学校有的是8201的，有的是4618的，有的是河南支持公安公社的，而我们都是4578的，什么也不是，又是着急，又是羡慕。着急的是人家都有的可抓，我们却没法抓，抓不出来又怎么有力地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呢？怎么翻身呢？羡慕的是，人家揪出一小撮就可以翻身了。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占了统治地位，就是由于派性的作怪，使我看不清“抓军内一小撮”的反动性。后来才知道，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抓军内一小撮。那时，正好是中央一省、一市、一个军区，一个军区逐一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样一抓，把许多中央派去解决问题的军队的领导同志也当作一小撮抓了出来，把枪、炮，子弹都抢跑了，许多解放军战士被打伤，有的甚至牺牲了年青的生命，这不是几百、几千，而是上十万人。他们都是工农优秀的子女，他们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炮下，而是死在我们这些自称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的手里，我们完全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抓军内一小撮是对人民的犯罪，把军队打乱了，把军队的领导同志当作一小撮抓来，把枪炮都抢跑了，敌人打进来，什么“4.3”派翻身啊，翻什么身，还不是人头落地。阶级敌人就是恨我们的解放军，有我们的解放军在，他们就不能为所欲为，林杰的反党集团是里通外国的，他们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有着不可告人的、极其阴险的目的。而他们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他们也正是看上了我们这些实际上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学生的投机性、狂热性和革命不彻底性，利用了我们这些弱点，我们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就是由于这些弱点，使我们不能很好地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事物，不能很好地识破敌人的诡计，失去了敌情观点。正如《文汇报》社论说的那样：“如果不注意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反而大搞宗派主义，就必然会把党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置于脑后，照此发展下去，就会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历史无情，前车可鉴，这次惨痛教训够我记一辈子的。要时时引以为戒，不可再犯。

第二，谈谈同同志打内战，搞智斗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脚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而我则常常扮演毛主席批评的这种人。我经常致力于研究打内战的战略战术，经常为了打内战，学习毛主席军事论文。这样是根本学不到毛泽东思想的。比如，当时高三搞了七十多人的所谓大联合，甩掉了一百多革命同学，当时我特别生气，我一直认为联战团就是大凑合、大杂烩，一直想攻攻它。但怕打内战，一直不敢这样做。因此，很想利用高三这个典型的例子对联战团作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但是怎么做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选。毛主席说：“同顽固派的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二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因此，我举得对高三的“大联合”，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写大字报、写大标语，大书特书、大批特批。我们一忍、再忍，你如此欺人，不还击实在软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又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要集中火力，攻高三这个最坏的所谓大联合，不要各班同时开炮，并且要适可而止，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得胜之后，要迅速收兵，转而继续进行大批判。这样，我们进行大批判，他们打内战，我们就会强盛起来。在学这段语录的时候，我却忘记了毛主席说这句话的根本立场，有利、有节地斗争方法是对敌人而言，是对反共顽固派而言，而我却把这句话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根本性的立场错误。毛主席说：“谁

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我在这里却把这个首要的问题忘掉了。实际上，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对毛主席著作，所采取的这样从派性出发，任意曲解的态度，实在是可耻的。我还时常学习毛主席这样一段语录：“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把联战团对我们的一些打内战的大字报，看成是敌人的“挑战书”、“激将法”，实在是错误的。人民的错误和敌人的阴谋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不是批评他们这样做的错误，而是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只顾自己搞批判，我觉得我应该成为毛主席所教导的那种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于此同时，我们又采取了一种很坏的手段，当时兵团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对联战团的大字报进行还击，我不同意，我对同学说，咱们不管联战团，不理它那套，咱搞咱的大批判，可是咱们应该放冷枪，勾引他们打内战。我们时而出、两张讽刺、挖苦、攻击联战团的大字报，让联战团还击，我们再进行批判，然后再出一、两张，就又搞批判，为联战团垮台制造条件，为井冈山兴旺创造条件。那时，在聊天中，我们总部也谈过以为这样做似乎也太不道德了，太卑鄙了，但是由于派性压倒了党性，还是继续采取了这种手段。我们看到联战团打内战的大字报越多，就越高兴。对于联战团一些同志违背大方向的作法，我们完全从派性出发，不是同志式地提出批评，希望他们改正错误，而是为了本派别的兴旺，置毛主席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的战略部署于不顾，故意去制造同志犯错误的外因条件，挑动同志干错事，自己看好看。现在想起来，是极端卑鄙的。那时，对于解放军也是这样，总是希望解放军犯大错误，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最好抓走我们一两个头头，这就最好不过了。这都是派性压倒党性的表现。从派性出发，只要对本派别有利，就可以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于不顾，干出许多违背大方向的坏事来。

在抓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我原来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后来接受了阶级敌人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口号，为什么我会干出那种损人利己的卑鄙事情？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兵团，自己的派别吗？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组织的兴旺，自己派别的兴旺吗？在自己的

灵魂深处还有没有更肮脏的东西在作怪呢？毛主席说：“只注意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毛主席一语道破了要害问题。从表面上看，我做的这些错事都是为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派别，但实际上是有着自己个人的肮脏目的的。过去，当兵团搞了一些比较好的活动之后，比如上次兵团在比较受压制的情况下进行了开门整风，就听到联战团有的同学说：“瞧，李南央把人家兵团闹得多好！”自己起草了一个总部关于大批判的号召书，就又听到许多同学的称赞。兵团大批判搞得好的时候，就又听到了许多好话。以后，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考虑革别人的命的时候总比较多，再加上经常听到表扬、称赞，夸奖的言词，使我更多地滋长了唯我独左，自以为了不起的思想。4月初，在成立井冈山兵团的动机里，我就多多少少掺杂着自己的私心。那时候，政委说：还不就是《送瘟神》那几个人在那儿闹。于是我就想，好，我们组织起来，干出个样儿给你瞧瞧，让你看看我们的能耐。随着兵团的迅速发展，这种显显自己的本事的思想也随着膨胀起来。总想兵团干出点什么一鸣惊人，或干出点轰轰烈烈的事情来，兵团兴旺了，那我自己也就能显显，出人头地了。自己这种思想是极端隐蔽的，但是它又非常有力量。就是由于这种私心，决定了我具备了小资产阶级的一种共性“投机性”。自觉不自觉地是在投革命之机。经常不是靠中央首长指示，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进行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马路新闻，东嗅嗅、西闻闻，抓住新闻宣传中的一两句话，进行资产阶级政客式的猜测，总想抢在人前，干出点惊人的事来，从中渔利。这次革命的大联合，我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暴露。那天夜里十二点多，同学到我家找我，从被窝里把我叫到学校。当时迷理迷糊就到了学校，在联合会上我态度很傲慢，尤其听到一个同学不大对味儿的讲话之后，我就更加旁若无人。原来是面冲大家，后来干脆把椅子一转，冲着墙说上话了，把那个同学说哭了。那天晚上把政委也气得够呛。开完会之后，到了总部，那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我就拍着桌子使劲地喊：“不理解、不理解，我就是不理解。”还说：“我想全部推翻晚上的方案，她们爱骂什么，就骂什么，我还是要拆台。”当时总部的同志都说我情绪不对头，还说在会上我们态度不好，要去找

政委检查。我一听就火了，本来是坐在桌子上的，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说：“什么态度不好，就是好。我看她们态度才不好呢！我没什么可检查的，要我脑袋也不去！”总部的同志说我：“你别发疯了，冷静点吧。”我说：“我冷静极了，一点也没发疯。”上午开联合大会的时候，宣言是我唸的，下来之后，同学们跟我说：“你唸得跟断了气儿似的。”唸完宣言，我就一头扎进了宿舍，躺在床上不起来了。当时好多战士都想不通，在宿舍呆着，我在宿舍里大喊大叫：“我不理解，一点也不理解。打仗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没听说大联合一声令下就得联合的。”“无条件联合就是修正主义联合，你看着吧，我总有一天要把它拆了的！”我这句话是火上浇油，对大家影响很不好。到卫戍区去报喜，我不但自己不去，还对大家说：“不去，不去，去干什么？让他们联战团去。”在六月份的时候，各中学“4.3”、“4.4”曾经有过联合的迹象，那时我们兵团也写过三次大联合的倡议，后两次倡议还是我写的，当时心里也确实想联合，对这种联合也比较理解，没有什么想不通。但是为什么事过三个月之后，同样也是搞联合，而且是我们一贯主张的组织联合，就如此不理解，就如此闹情绪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这种现象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在派性比六月份强了，现在的党性比六月份少了。而且也说明六月份的联合党性是高的，但是不可否认多多少少掺杂着派性。当时井冈山在学校根本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处在受压抑的地位，只有二百人左右。当时看起来，井冈山的发展似乎已到头了，不会再有多少人参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搞组织联合，对井冈山是有利的，起码可以争得当时还没有的合法地位。可是当六月份的联合，因种种原因（原因我不谈了，容易成为指责别人）僵持下来之后，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联战团连续犯了许多错误，如：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给自己分成了等级，自己分裂了自己；提出了打倒聂元梓，让聂元梓滚出市革会。这实际上是参加了大学的派别斗争；对倾向井冈山的同学进行了排斥，大方向抓得不太好，总部领导不得力，打内战比较多。于是较快地形成许多同学退出联战团上了山。当时东红红支队也跟我们联系，表示要胜利汇师井冈山。井冈山

发展很快，明显地兴旺起来，联战团则有走下坡路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派性渐渐强了。心想不吃掉你联战团，也吃掉你几百人。在这种形势对井冈山似乎是很有利的情况下，中央首长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就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我怎么能够理解呢？井冈山似乎显得非常窝囊，而井冈山如听从，又如何能显出我的本事呢？正如《人民日报》9.22日社论中说的那样：这次大联合的潮流，是对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猛烈冲击。这次大联合，我怎么跟不上趟，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我触动是很大的，唯我独左，特别是通过这次集训，对我灵魂的触及更大。使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在我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的时候，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我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更深入发展进入了从政治、思想，理论上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的关键时刻，单靠着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就远远不够了。不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就会跟不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屡犯错误。不斗私是根本不能革命到底的，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列宁说过：“小资产阶级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那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绝不能从事独立的活动。”我要继续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我要永远成为革命的动力，而不成为绊脚石、阻力，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斗私批修”。不这样作，就会被历史的车轮所抛弃。在我们的社会，停止不前、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定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又说：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呵！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斗争。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全国的青年们，努力呵！”

我一定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永远努力，永远拼命向前。■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着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